臺大歷史學報第 62 期
2018 年 12 月，頁 139-212

BIBLID1012-8514(2018)62pp.139-212
2017.11.22 收稿，2018.2.13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812_(62).0004

從人文主義史學到哲學的歷史
——吉朋歷史書寫的近世歐洲史學脈絡

楊　肅　献*

提　要

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是 18 世紀啟蒙史學的經典之作。這部鉅構是吉朋結合文藝復興「古典考證」與啟蒙運動「哲學心靈」兩種知識傳承寫成。吉朋早年遍讀古代希臘與羅馬典籍，又博覽近代早期的古典學術研究，累積豐富的羅馬史知識與材料。他將這些古代史知識轉化成完整的歷史敘述，背後有一套清晰的史學觀念作為寫作指導。這套史學觀念傳承自近代早期歐洲史學，呈現在吉朋早期出版的《論文學研究》，並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書寫中實踐。

本篇論文從近代早期歐洲史學的脈絡探討吉朋史學觀念的形成與實踐，全文聚焦於三個主題：首先，追溯人文主義史學到哲學的歷史觀的演變；其次，分析吉朋有關史實、歷史真相與歷史重建的論述；其三，討論吉朋的「哲學的歷史」觀念及其理想的史家典範。吉朋的史學思想與實踐在許多方面都具有現代性，從史學史角度看，乃是歐洲歷史寫作從人文主義史學過渡到現代史學的重要關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鍵詞：愛德華·吉朋　啟蒙運動　羅馬帝國　人文主義史學　哲學的歷史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yangsh@ntu.edu.tw.

前 言
一、從人文主義史學到哲學的歷史
二、吉朋論史實、真相與歷史再現
三、吉朋與「哲學的歷史」
四、吉朋與他的典範史家
結 語

前 言

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以下簡稱《衰亡史》）是 18 世紀啟蒙史學的經典之作。這部鉅構結合文藝復興「古典考證」與啟蒙運動「哲學心靈」兩種知識傳承，書寫「那些足資紀念的系列變革，它們在約 13 個世紀的過程中，逐漸地顛覆、並最終摧毀了人類偉大成就的堅實結構」。[1]

《衰亡史》猶如一首壯闊的史詩，其寫作乃是建立在吉朋長期的古典閱讀上面。吉朋年輕時遍讀古代希臘與羅馬典籍，又博覽近代早期人文學者所作的古典學術研究，累積豐富的羅馬史知識與材料。他將這些古代史知識轉化成完整的歷史敘述，背後有一套史學觀念作為寫作指導。這一套史學觀念是什麼？從何而來？是本文關心的課題。

在《衰亡史》第 70 章近尾聲時，吉朋敘述 16 世紀時羅馬教宗如何在羅馬建立專制統治與羅馬教廷如何擴張對義大利的控制。行文中，吉朋針砭三位文藝復興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 1492-1503 在位）「罪惡滿盈」、朱里亞斯二世（Julius II, 1503-1513 在位）「黷武好戰」與利奧十世（Leo X, 1513-1521 在位）「作為寬宏」。他以塔西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Edward Gibbon, “Preface of the Author (1776),”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Methuen & Co., 1905), vol. 1, p. v. 中譯文為筆者自譯，下同。

式的簡約筆調，對 3 位文藝復興教宗的評論點到為止，但在此處下一個註腳，指出佛羅倫斯歷史家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59-1527）與圭西亞狄尼（Francesca Guicciardini, 1483-1540）已處理過這一課題。隨後筆鋒一轉，繼續寫道：

> 這兩位史家，與其傑出的繼承者保羅神父和達維拉，很公允地被尊為是第一批以近代語言撰史的史家。直到當前這個時代，才有蘇格蘭起而與義大利自身競爭這個榮譽。[2]

這個腳註勾勒出近代歐洲史學發展的簡要譜系：16 世紀時，馬基維利與圭西亞狄尼開創了以「近代語言」書寫歷史的傳統；17 世紀以後，這一史學傳統由威尼斯（Venice）修士保羅．沙比（Paolo Sarpi, 1552-1623）與帕都亞（Padua）的恩利科．達維拉（Enrico Davila, 1577-1631）所傳承。到了 18 世紀，蘇格蘭的史學繼之而起，成為此一傳統的新重鎮。吉朋提到蘇格蘭史學，心裡想的自然是大衛．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和威廉．羅伯森（William Robertson, 1721-1793）兩位啟蒙史家。

吉朋在其知識啟蒙階段即已接觸到此一「近代語言」歷史書寫傳統，並在潛移默化之中攝取近代早期歐洲史學的精華，自身甚至成為此一史學傳統的傳繼者。[3]《衰亡史》出版之後，英國文學圈曾經恭維吉朋，把他和休姆、羅伯森兩人並列，譽之為「不列顛史家三雄」。[4]吉朋和歐洲「近代語言」歷史書寫傳統之間的密切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根據吉朋的自傳，他少年時期因體弱多病經常輟學在家；療養期間，為了打發時間，常在外祖父的書房翻書、看書，意外養成愛書的習慣。由於乏人指導，他能自由自在地閱讀，從傳奇、歷史、遊記，到古典的著作，累積龐雜的學問。[5]大約 1750 年前後，吉朋因偶然的機會「努

2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7, p. 296. n. 101.

3 Hugh Trevor-Roper,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Macmillan, 1967), p. 200.

4 Edward Gibbon, "To William Robertson, 1/9/1783," in *Th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 ed. J. E. Norton (London: Cassell, 1956), vol. 2, p. 361.

5 關於吉朋早年的教育，參見楊肅獻，〈青年吉朋——一位羅馬帝國歷史家的養成〉，《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力研讀」蘇格蘭學者約翰・坎伯（John Campbell, 1708-1775）與英格蘭學者湯瑪斯・賀恩（Thomas Hearne, 1678-1735）的著作，其「雜陳的胃口逐漸歸入歷史的路線」。[6]坎伯編寫一部《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分為〈古代〉與〈近代〉兩篇，其中〈古代〉篇在 1736 至 1744 年間出版。[7]賀恩則出版《史學導引》（*Ductor Historicus*）一書，內容除了討論歷史學理論，也推薦一系列古典史著，作為學史的入門書。[8]這兩部書成為少年吉朋進入史學世界的嚮導。

根據賀恩的指引，少年吉朋先讀一批英譯古典史籍，如艾薩克・里托貝利（Isaac Littlebury, 1657-1710, 英格蘭人）譯的希羅多德（Herodotus, c.485-c.425 BC）《歷史》（*Histories*）、愛德華・史培爾曼（Edward Spelman, d. 1767, 英格蘭人）譯的色諾芬（Xenophon, c. 428-c. 354 BC）《居魯士遠征記》（*The Expedition of Cyrus*）、湯瑪士・戈頓（Thomas Gordon, 1692?-1755, 蘇格蘭人）譯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c. 56-117）的《著作集》（*Works*），與一部英譯的普羅科比烏斯（Procopius of Caesaria, c. 500-562?）著作（極可能是《戰史》〔*History of the Wars*〕一書）。吉朋形容自己當時是「狼吞虎嚥」般地讀完這一批古典史籍。[9]上述史家中，塔西陀之後竟成為吉朋心儀的史家典範。

除了古典史學，吉朋也接觸到近代史家的著作，包括：馬基維利的《佛羅倫斯史》（*Istorie Fiorentine*）、沙比的《特倫特大公會議史》（*Istoria*

史學》第 12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臺北），頁 52-62。

6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31.

7 John Campbell,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to the Present: Compiled from Original Authors* (London: printed for J. Batley; E. Symon; T. Osborne; and J. Crokatt, 1736-1766?).

8 Thomas Hearne, *Ductor Historicus: or, A Short System of Universal History,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t* (London: printed by H. Clark, for Tim. Childe, 1714). 關於賀恩《史學導引》，參見 J. W. Johnson, *The Formation of English Neo-Class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35, 41-42.

9 Gibbon, *Autobiography*, p. 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1619）、約翰・史畢（John Speed, 1551/2-1629, 英格蘭人）的《不列顛史》（*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under the Conquests of Romans, Saxons, Danes, and Normans*, 1611）、達維拉的《法國內戰史》（*Istoria delle guerre civili di Francia,* 1630 / *The Historie of the Civil Warres of France,* 1647）、封斯瓦・梅哲雷（Francois Eudes de Mezeray, 1610-1683, 法國人）的《法蘭西史》（*Histoire de France*, 1685）、保羅・拉賓（Paul de Rapin-Thoyras, 1661-1725, 法國人）的《英格蘭史》（*Histoire d'Angleterre*, 1724-1727），與阿奇波・包爾（Archibald Bower, 1686-1766, 蘇格蘭人）的《教宗史》（*History of the Popes*, 1748-1766）。[10]

值得注意的是，吉朋閱讀的近代史家中，馬基維利、沙比、達維拉是他指名的以「近代語言」書寫歷史的先驅。從其《日誌》（*My Journal*），可知吉朋也在 1759 年初研讀休姆《英格蘭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與羅伯森《蘇格蘭史》（*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755），[11]這兩位蘇格蘭史家，是他眼中以「近代語言」寫史的 18 世紀後起之秀。在歐洲史學上，這批以「近代語言」治史的近代史家傳承早期人文主義史學，經過調整與轉化，逐步建立一套新的哲學的歷史學，開啟啟蒙運動的史學。在歷史書寫上，吉朋基本上是遵循此一傳統，但發揮得更精到、細緻。

2001 年與 2013 年，筆者先後發表了〈青年吉朋——一位羅馬帝國史家的養成〉與〈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兩文，[12]分別探討吉朋作為一個「羅馬帝國史家」的養成過程，與他書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古典學術根基。本篇論文則試圖把吉朋放到近代早期歐洲史學史的脈絡，討論其歷史書寫背後的史學思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 Gibbon, *Autobiography*, p. 32.

11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To January 28th, 1763*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29), p. 9.

12 楊肅献，〈青年吉朋——一位羅馬帝國歷史家的養成〉；〈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臺大歷史學報》第 51 期（2013 年 6 月，臺北），頁 119-180。

一、從人文主義史學到哲學的歷史

從 16 世紀到 18 世紀，歐洲歷史家在歷史寫作上發生了重要變化，逐漸從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史學」（Humanist History）發展為啟蒙時代的「哲學的歷史」（Philosophical History）。在這過程中，歐洲史家逐漸形成一套歷史寫作理論，也發展出一套歷史書寫的模式。吉朋後來撰寫《衰亡史》，即是此一近代歷史寫作理念的一個實踐。

（一）人文主義史學的興起

14 世紀後期，義大利一批人文學者開始摹仿古典史家的寫作風格，嘗試撰寫歷史，開啟人文主義史學的先河。這一個史學運動由佛羅倫斯學者與政治人物布魯尼（Leonardo Bruni, 1370-1444）啟其端，柏吉歐（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承其緒。到 16 世紀早期，馬基維利與圭西亞狄尼等人更將人文主義史學推到一個高峰。

近代人文主義史學是文藝復興「人文運動」（Humanism）的一部分。文藝復興的精神是「復古」（revival of antiquity），試圖透過希臘、羅馬典籍與文物的發掘，回復古典文明的原貌，並吸收其思想作為現實生活的指引。[13]最初，人文學者的興趣是在發現古籍，而非研究歷史，其對歷史的興趣是因應解釋典籍之需而生的副產品。[14]自 1330 年代以來，一些古典史籍在人文學者的獵書熱中陸續出土。佩托拉克（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首開獵書風氣，他除了蒐集到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的書信與《修辭學》（*Rhetorica*）外，也獲得李維（Titus Livius, 59 BC-AD 17）《羅馬史》（*Ab Urbe condita*, 英譯 *History of Rome*）的殘卷，[15]並進行整理、註釋與考訂。[16]在 1350 到 1500 年間，塔西陀的

13 Nicholas Mann, “The Origins of Humanism,”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enaissance Humanism*, ed. Jill Kray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

14 E. B. Fryde, “The Revival of a ‘Scientific’ and Erudite Historiography,” in *Humanism and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3), p. 4.

15 L. D. Reynolds and N. G. Wilson, *Scriber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年史》（*Annales*）與《歷史》（*Historiae*）也從塵封的修道院圖書館重見天日。[17]到 16 世紀初，古希臘、羅馬主要史家的著作，包括沙魯斯特（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86-35 BC）、瓦勒瑞烏斯（Valerius Maximus, 1 世紀早期）、李維、凱撒（Julius Caesar, 100-44 BC）、蘇東尼烏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 約 69-122 之後）、科西烏斯（Quintus Curtius Rufus, 1 世紀）、弗羅魯斯（Florus, 2 世紀）與塔西陀等，已經普遍為文藝復興人文學界所認識。[18]

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史家即是從這一批羅馬歷史家的著作，去發掘史學理論與實踐的典範，以建立一套人文主義的歷史寫作規範。在歷史理論方面，他們主要是受到羅馬共和晚期文人兼政治家西塞羅的啟發。

西塞羅在〈論演說家〉（"De oratore"）一文對如何適當地書寫歷史這個課題有精闢論述。「一個演說家會如何書寫歷史？」他提出幾條基本法則。首先，歷史寫作的第一守則是客觀地陳述事實真相：

> 有誰不知道，撰寫歷史的第一條法則就是，除了事實真相，作者不能講其他任何事情？它的第二條法則不就是，作者必須大膽地講述整個事實真相嗎？他的作品一定不能有任何偏見，對嗎？也不能有邪惡的東西，對嗎？這種基礎工作，當然是每個人熟悉的。[19]

西塞羅鼓勵歷史家以客觀態度大膽地陳述「事實真相」，強調這是每個歷史家都應熟悉的「基礎工作」。

客觀陳述事實真相固然是史家的基本美德，但是事實本身並不會自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0-131.

16 有關佩脫拉克的李維研究，參見 Giuseppe Billanovich, "Petrarch and 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Livy,"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4, no. 3/4 (1951, London), pp. 137-208.

17 Reynolds and Wilson, *Scribers and Scholars*, pp. 133, 139.

18 參見 Peter Burke, "A Survey of the Popularity of Ancient Historians, 1450-1700," *History and Theory* 5, no.2 (1966, Connecticut), p. 137, "Table 2".

19 西塞羅著，〈論演說家〉，收入西塞羅著，王曉朝譯，《西塞羅全集．修辭學》（臺北：左岸出版社，2005），頁 3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動形成歷史。羅馬先賢如庇克托（Quintus Fabius Pictor, 生於約 270 BC）與加圖（Marcus Porcius Cato, 234-149 BC）都撰寫過歷史，然只記錄事實不作修飾。西塞羅指出：

> 歷史一開始就是編年史的彙編，記錄一些雜事以保存一般的傳說，從城邦早期開始，直到普伯里烏斯・穆西烏斯（Publius Mucius）擔任祭司長時，每位大祭司都曾經寫下他任職那一年的所有事件，記在白板上，懸掛在家裡，人人都可自由到那裡熟悉這些記載。至今，人們仍把這些記載稱作大祭司編年史（Pontifical Chronicle）。[20]

在他看來羅馬歷史家寫的「僅是編年史，沒有別的東西」，層次上不如希臘人。希臘歷史家因有修辭訓練，歷史寫得比羅馬人好；羅馬人若要把歷史寫好，單靠「不撒謊」並不足夠，而須像希臘人一樣學好修辭技巧。[21]

西塞羅認為歷史文章的要素是「故事和措詞」，亦即史家撰寫歷史時必須兼顧敘事與修辭。在「故事」方面，首先要包含年代的排列、地理的描寫與戰爭的敘述：

> 主題的性質需要按年代排列，需要有地理方面的描寫。人們在閱讀時，會不斷尋找那些值得記載的重要事件、戰役的計畫、具體的行動、後續的結果，因此作者在涉及這樣的計畫時，也需要表示贊同。

敘述發生何事之後，史家應進而說明事件如何發生？為何發生？西塞羅主張：

> 敘述成就時，不僅要講述做了些什麼，或者說了些什麼，還要講述做或說的方式。在評價後果時，為了解釋所有與此相關的原因，要看它的源起是否出於偶然，或者是否隨意，或者是否蠻幹。[22]

總之，歷史家不僅要呈現事件內容、追溯發生過程，也須探究發生原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 西塞羅著，〈論演說家〉，頁 388-389。

21 西塞羅著，〈論演說家〉，頁 388。

22 西塞羅著，〈論演說家〉，頁 391。

在「措詞」方面，西塞羅相信史書的良窳最終繫於修辭的功夫。早期羅馬史家把「準確性」當作史家的唯一優點，不懂得修飾作品，只求敘述能被理解即可。[23]那麼，歷史文章應當如何書寫？西塞羅建議：「要追隨某種語言和風格是簡單易行的，只要按規定的方向前進，有一定程度的明晰，不要變化多端，避免法庭上使用的粗魯語言，或律師使用的諷刺人的警句。」[24]換言之，歷史書寫風格應力求簡潔、明晰和文雅。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史家接受西塞羅的歷史觀念，也強調歷史書寫應兼顧真實與修辭。不過，西塞羅本人並不是歷史家，沒有歷史著作可資借鏡。在寫作實踐上，人文主義史家是從古羅馬史家中尋找參照的典範，而沙魯斯特和李維則是主要的模仿對象。

沙魯斯特和李維是共和後期、帝國初期的羅馬史家，其史學都深受希臘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460-395 BC）的影響。在古典希臘，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創立歷史學，建立了一種書寫「可信歷史」的方法。[25]不過羅馬人對希羅多德歷史敘述的可靠性多所質疑，認為修昔底德才是「可信的史家」的典範。[26]修昔底德是雅典公民，曾經親身參與希臘內戰：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他深具歷史洞識，在戰爭初期即看出這場戰爭的歷史意義，發憤要為世人留下見證。[27]他的《伯

23 西塞羅著，〈論演說家〉，頁 389。

24 西塞羅著，〈論演說家〉，頁 391。

25 關於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的史學，參見 Arno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34-44.

26 希羅多德的《歷史》記載許多域外的珍奇異事，古希臘人與羅馬人無法理解，以為他在說謊。西元前 4 世紀後，希羅多德常遭人誣為「騙子」。關於這點，見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 48. 在羅馬人眼中，希羅多德不是可靠的歷史家，西塞羅即稱：「在歷史中，一切都應以事實真相作為判準，……希羅多德這位歷史之父……敘述了無數虛妄的事。」見 Marcus Tullius Cicero, *De re publica & De legib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 W. Key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 301. 希羅多德史學名聲的沉浮，參見 J. A. S. Evans, "Father of History or Father of Lies: The Reputation of Herodotus," *The Classical Journal* 64, no. 1 (1968, Illinois), pp. 11-17.

27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開宗明義說：「這次戰爭剛剛爆發時，我就開始寫我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確立幾項治史原則。首先，史家本人的「見證」（eyewitness）是最可靠的證據，他人的轉述居次；[28]其次，由於史家唯一可能見證的是現代，他只可能書寫「現代」的信史；其三，修昔底德書寫的是雅典城邦，城邦生活的核心是政治，因此歷史即是「政治史」；最後，歷史的目的乃是藉考察個別事實以理解普遍的人性，而人性永恆不變，故研究當代史即可達到此一目的。[29]修昔底德以理解人性為治史的終極目標，他的史學內在有一種統攝的哲學理念，富有「哲學的歷史」的意涵。

西元前 2 世紀，希臘史家波力比烏斯（Polybius, 200-118 BC）將修昔底德引介給羅馬人。[30]羅馬史家包括沙魯斯特、李維、塔西陀等，在修昔底德的影響下建立羅馬史學，文藝復興史家則又模仿羅馬史學而形成人文主義史學。根據一項研究，從 15 世紀中期到 16 世紀末期，古代史家中最受歡迎的是沙魯斯特、瓦勒瑞烏斯、凱撒和李維。[31]其中，沙魯斯特和李維尤其被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史家奉為史學的典範。[32]我們可

歷史著作，相信這次戰爭是一場偉大的戰爭，比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任何戰爭更有敘述的價值。……這是希臘人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騷動，同時也影響到大部分非希臘人的世界，可以說，幾乎影響到整個人類。」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上冊，頁 2。

28 「關於戰爭事件的敘述，我確定一個原則：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據；我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見的，就是我從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裡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的。就是這樣，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目擊者對同一個事件有不同的說法，由於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或者由於記憶的不完全。」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上冊，頁 20。

29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45, 47. 關於修昔底德史學，參考 Donald Kagan, *Thucydides: The Reinven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9).

30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 47.

31 Burke, "A Survey of the Popularity of Ancient Historians, 1450-1700," p. 137.

32 人文主義史家主張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不宜親自撰寫自己曾參與其間的事件的歷史。在三位古羅馬作者中，凱撒是政治人物，又是歷史事件（高盧戰爭）的當事人，遂不被認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檢視兩者的著作，從中歸納出古典歷史寫作的方法與特色。

沙魯斯特是西元前 1 世紀羅馬政治人物，在共和內戰中支持凱撒，曾出任護民官和北非總督。西元前 44 年凱撒被刺，他退出政壇投入歷史寫作，有《卡提連戰爭》（*Bellum Catilinae*）與《朱古達戰爭》（*Bellum Iugurthinum*）傳世。前者寫西元前 63 年羅馬顯貴卡提連（Catiline）陰謀反叛共和導致的一場內戰，後者敘述西元前 111 至 105 年羅馬對北非努米迪亞（Numidia）國王朱古達（Jugurtha, d. 109 BC）的戰爭。沙魯斯特亦步亦趨修昔底德的治史方法，書寫他親自見證的當代史事，主題是戰爭。[33]他仿效修昔底德的作法，在敘事中穿插「虛構演說」（invented speech）、「人物刻畫」與「題外論述」（digression），一方面使敘事生動，避免編年的單調，同時也藉此探究事件原因與行動背後的動機。[34]沙魯斯特重視修辭，文字有力、敘事生動，超越羅馬早期的編年史家。

李維是一個文人與歷史家，活到奧古斯都（Gaius Octavius, 27-14 BC 在位）時代。他仍懷抱共和思想，投入《羅馬史》的寫作，以敘述建城以來羅馬臻至偉大的史事。李維遵循修昔底德的寫史先例，把《羅馬史》分為 142「書」、[35]每 10 書再成一個單位（decade）。敘事方面，李維也依時序逐年敘述，其中穿插「虛構演說」、「題外論述」與「人物刻畫」等元素。更重要的是，他是站在修辭家和道德家的立場書寫歷史。

為「典型的」歷史家。參見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206-207. 本文引用 Norton 版。

33 有關沙魯斯特的史學，參見 Michael Grant, *The Ancient Historians*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Books, 1970), pp. 195-213.

34 M. C. Howatson, and Ian Chilvers, eds., *Oxford Concise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77.

35 古典希臘史家以洋皮紙寫作，並將書分為若干「捲」（rolls）。修昔底德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當作一個整體，並未將其分為「書」（books）。希臘化時代，亞歷山大城的歷史家開始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分成 8 書，漸成慣例，被羅馬史家援用。參見 M. I. Finley, "Introduction," in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ex Warne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4/1972), p. 12, n.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方面，他重視修辭技巧，主張史家固須客觀陳述事實，但應以文學形式呈現。另一方面，他也強調歷史的訓誡作用，希望讀者從其書獲得歷史的教訓。這從他書中表露的關懷可看出一二：要紀念羅馬的豐功偉績、敘述帶領羅馬偉大之人物與生活方式、闡明導致共和傾頹的道德衰敗的原因。[36]

沙魯斯特與李維寫的都是政治史，前者寫單一戰爭，後者寫城邦的歷史。人文主義史家之中，有一批追隨沙魯斯特，投入單一戰爭的寫作，另有一批則模仿李維，回頭寫自己城邦的歷史，特別是佛羅倫斯的史家。[37]

（二）從「年鑑」到「歷史」

早在 14 世紀之初，帕都亞的穆沙拓（Albertino Mussato, 1262-1329）即摹仿凱撒、沙魯斯特和李維，以拉丁文寫過一部《歷史》（*Historiae*）。[38] 這是人文主義歷史寫作的最早紀錄。到 15 世紀早期，人文主義史學在佛羅倫斯有重要進展。布魯尼、柏吉歐與畢揚多（Flavio Biondo, 1393- 1463）等人開創人文主義新史學，將歐洲的歷史寫作從「中世紀」帶入「近代」。

羅馬帝國滅亡後，古典的歷史書寫傳統隨之斷絕，到中世紀時學者「發明」一種新的歷史寫作形式：「年鑑」（chronicle）。[39]「年鑑」形成於 9 到 10 世紀，作者大都是修道院或教會人士，記錄修道院周遭發生的事物。中世紀的年鑑通常以「世界年鑑」（universal chronicle）形式撰寫，從創世紀或基督誕生寫到作者的時代，以編年次序記錄作者的見

36 Howatson and Chilvers, eds., *Oxford Concise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p. 314. 有關李維史學，參見 P. G. Walsh,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37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 209.

38 Reynolds and Wilson, *Scribers and Scholars,* pp. 126-127.

39 Denys Hay, *Annalists and Historian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nthuen & Co. Ltd., 1977), p. 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聞。[40]早期年鑑主要是以拉丁文寫作，但後期的年鑑史家也多有改用方言者，留下許多樸實的中世紀紀錄。

正如人文學者鄙夷中世紀的拉丁文，人文主義史家也鄙視中世紀的年鑑，以其文字不雅訓，紀事零碎片段，稱不上正格的歷史。但人文主義史家眼中的缺點，從史學上看卻也可能是一種優點：中世紀年鑑紀事直率，不講求修辭，其樸實的記載反而保存了事實的原樣。後來人文主義史家書寫中世紀歷史時，這類年鑑往往是其倚重的重要史料。[41]布魯尼的佛羅倫斯史即大量引用義大利編年史家維蘭尼（Giovanni Villani, 1276-1348）的《新年鑑》（*Nuova Cronica*）。

布魯尼是佛羅倫斯的人文學者兼政治人物，開創了人文主義史學。他在 1427 至 1444 年出任佛羅倫斯總理，於 1442 年出版《佛羅倫斯人民史》（*Historiarum Florentini populi*）。這部史著跳脫基督教史觀，以「古代」、「中世紀」與「近代」三段架構，從俗世角度敘述佛羅倫斯史，涵蓋羅馬時期到 1402 年，被認為是第一部「近代的」史學著作。[42]柏吉歐從 1453 年起擔任總理，延續以城邦總理身分撰史之慣例，也在公餘寫 1350 至 1455 年的《佛羅倫斯史》（*Historia Florentina*，生前未完成，至 1476 年由其子譯為義大利文出版）。布魯尼與柏吉歐關注的是佛羅倫斯的歷史，畢揚多則轉而撰述古典結束以來的義大利史。畢揚多是一位著名的古物學者，也投入人文主義的歷史寫作；[43]他自 1439 年起開始撰

40 有關中世紀「年鑑」的出現，參見 Hay, *Annalists and Historians*, pp. 38-62.

41 Fryde, “The Revival of a ‘Scientific’ and Erudite Historiography,” p. 7. 有關人文主義史學如何運用中世紀的年鑑，參見 Mark Phillips, “Machiavelli, Guicciardini, and the Tradition of Vernacular Historiography in Flor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4, no. 1 (February 1979, Oxford), pp. 86-105.

42 B. L. Ullman, “Leonardo Bruni and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in *Studie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Roma: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55), pp. 321-344.

43 畢揚多運用語言學大師瓦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的考證精神，確立科學的古物研究方法，使古物研究成為一門嚴謹的學問。他以實證方法研究、整理羅馬城和義大利的歷史地理與文物史蹟，出版《古羅馬的復原》（*De Roma instaurata*, 1444-1446）、《古代義大利描述》（*Italia illustrata*, 1448-1453）與《羅馬的榮光》（*De Roma triumphan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寫《羅馬帝國衰亡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orum imperii*），從 410 年西哥德人（Visigoth）洗劫羅馬，敘述到 1441 年，是一部洋洋巨構。[44]

這一批早期人文主義史家，基本上是模仿古典史著的成例撰寫歷史。布魯尼將《佛羅倫斯人民史》分作 12「書」，畢揚多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也分為 42 書，並進而仿效李維以「十書」一為個單位。資料運用上，布魯尼和古典史家一樣，是以事件發生當時的見證紀錄為主要依據，再參證政府檔案資料。《佛羅倫斯人民史》在 13 世紀中期到 14 世紀中期部分，主要是依據維蘭尼的《新年鑑》，再參證佛羅倫斯官方檔案。畢揚多寫到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主要採用曾親身參與東征之聖雷米的羅伯特（Robert of St Remy）之《十字軍東征史》（*Historia iherosylimitana*），認為紀事比較精確，但也謹慎地參證了較晚的泰爾大主教威廉（William of Tyre, 1130-1186）的《拉丁諸王史績》（*Historia rerum in partibus transmarinis gestarum*）一書。[45]

（三）從古典歷史到白話歷史

文藝復興的史家從古羅馬史學中攝取歷史書寫的理論與方法。從西塞羅等的著作，他們認知「真正的歷史」（true history）的書寫必須「真相」、「辭章」與「訓誡」兼備。史家應以客觀態度重現事實真相；以

1456-1460），是近代歐洲古物學的經典。有關畢揚多的古物學，參見 Jeffrey A. White, “Introduction,” in Flavio Biondo, *Italy Illuminated*, vol. 1, ed. and trans. Jeffrey A. Whi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vii-xxvii; 楊肅献，〈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頁 128-129。

44 參見 Denys Hay, “Flavio Biondo and the Middle Ages,” in *Renaissance Essays* (London: The Humbledon Press, 1988), pp. 35-63.

45 Robert Black,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Beginning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6, no. 378 (January 1981, Oxford), p. 41. 有關維蘭尼的史學，參見 Louis Green, *Chronicle into History: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Florentine Fourteenth-Century Chronic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9-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流暢、雄辯的文采表述史實，以吸引讀者的興趣；並要記述、讚揚歷史人物的美德，為後世立典範。[46]他們遵循沙魯斯特和李維的書寫格式寫歷史：史書須分若干「書」，並依時序撰寫；內容以政治史與軍事史為主；撰寫時基本上是依循單一史源，且通常不註出處或檢核證據。[47]實際寫作時，人文主義史家也仿效古代史家，每「書」開頭會以一段「引論」（reflections）破題，陳述作者觀點；敘事過程中，適時穿插虛構演說、人物刻劃、脫題討論、戰爭場景描述等，可增加敘事的活潑性，也藉以解釋事件的因果。[48]

早期人文主義史家，如布魯尼、柏吉歐與畢揚多等，都嚴守古典史家的典範，並以拉丁文撰寫。他們開創近代人文主義史學的書寫傳統。但是，16 世紀以後人文主義史學發生變化，一個重要變動是逐漸放棄「古典語言」，改以「近代語言」作為撰寫工具。馬基維利的《佛羅倫斯史》與圭西亞狄尼的《義大利史》（*Storia d' Italia*），都捨棄拉丁文，改以「方言」（Vernacular）的義大利語來書寫。

歷史寫作上，馬基維利與圭西亞狄尼基本上仍遵循人文主義史學的慣例。馬基維利在 1520 年代寫《佛羅倫斯史》時，將全書分作 8 書，每書都以「引論」開頭；在敘事時通常只循單一史源，但改寫為雄辯有力的文字；敘述過程則不時穿插精心加工的演說，對戰爭的描述鉅細靡遺。和人文主義史家一樣，馬基維利敘述重大事件時，都會安排某種預兆，預告事件的發生。[49]同樣，圭西亞狄尼的《義大利史》分為 20 書，各書再依年代細分；他重視演說詞，常安排成對出現，以陳述正反雙方觀點；他也重視戰役的描寫，並力求符合歷史真實的要求。[50]

不過，馬基維利與圭西亞狄尼也有突破人文主義史學框架之處。首

46 Black,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Beginning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pp. 36-38.

47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p. 208, 209, 210, 221.

48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p. 210-211; Black,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Beginning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pp. 42-45.

49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 237.

50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 2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先，他們的歷史觀明顯從「神佑主義」轉向「俗世主義」。馬基維利不再視歷史的變動為基督教「神意」的安排，而認為是古典「幸運女神」（fortuna）操弄的結果；[51]圭西亞狄尼走得更激進，主張事件的因果應從事件內部，而非不可捉摸的外部力量去尋找。他在《義大利史》中從政治領導者的心理與動機，來討論事件的動因，建立一種「理性的」因果論。[52]其次，他們也提倡「實用史學」（pragmatic history），強調歷史對當代政治的實用價值。馬基維利從古今史事與人物中，尋找可以驗證政治法則的範例，作為政治人物的指引；圭西亞狄尼則認為歷史可協助了解當代政治情勢，為政治行動提供指導。[53]這是近代歐洲歷史書寫走向「俗世化」的開端，初露出「哲學的歷史」的精神。

從馬基維利與圭西亞狄尼以後，人文主義史學在義大利漸趨沒落，這個變化與 16 世紀中期以後義大利政治與宗教的變動有關。從 1540 年代起，羅馬教廷為因應宗教改革的挑戰，推動教會革新，並在「特倫特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1557）到達高點。[54]這次羅馬教會革新，傳統史家稱為「對抗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近來史家則名之「公教的革新」（Catholic Reformation）。兩個標籤各具意義，實際上反映教廷改革的兩大關懷。

從「對抗改革」角度看，羅馬教會革新目的是要抗阻文藝復興的影響。教廷視人文主義為宗教改革的罪魁禍首，心態上敵視文藝復興，攻擊其異教思想與違背道德。[55]在這種心態下，樞機主教博敏（Robert Bellarmine, 1542-1621）著書替教廷的傳統與權威辯護，以對抗宗教改革

51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p. 251-253, 269-270, 288-290.

52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p. 290-294.

53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p. 230-233, 238-239.

54 有關特倫特大公會議，參見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the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0-25.

55 William J. Bouwsma,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Renaissance Values in the Age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294, 2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神學的衝擊；[56]另一樞機主教巴隆尼烏斯（Caesar Baronius, 1538-1607）則撰寫教會觀點的教會史，主張教會屬於聖界，永不腐化墮落，只是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展現，但始終保持原本的純淨。[57]從「公教革新」角度看，特倫特大公會議通過系列的改革措施，提升教會形象，重拾信徒的信心。不過，在教義與權威上，教廷仍堅持傳統的立場，宣告既有教義的正確性，並重申教宗權威的至高性。

羅馬教廷在特倫特會議以後威望大幅提升，增強其對義大利的政教影響力。義大利此時因長期的義大利戰爭（The Italian Wars, 1494-1559）陷入權力真空狀態，教廷是義大利最大的本土勢力，聲明諸邦既接受特倫特的決議，即須尊重教廷權威，遂對各邦軟硬兼施，意圖將義大利納入控制之下。教廷以高壓手段監控義大利的思想活動，打擊人文主義。在教廷的眼中，馬基維利與圭西亞狄尼代表無神論、邪惡，他們的著作或列入「禁書目錄」或遭到刪節。[58]由是，16 世紀中期以後義大利人文主義史學奄奄一息，直到 17 世紀初才有沙比起而挑戰羅馬教會權威。

1605 年，威尼斯在教產處理與教士司法管轄方面與羅馬教廷發生爭議。[59]教廷假特倫特詔令之威，要求尊重教宗權威與教會的既有權益，威尼斯則以其事涉城邦主權堅拒。次年，教廷下令予威尼斯以停止教權（interdict）之處分。[60]在這次爭議中，威尼斯政府聘請沙比擔任神學顧

56 Bouwsma,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pp. 314-323.有關聖博敏的史學，詳見：E. A, Ryan, *The Historical Scholarship of Saint Bellarmine* (New York: Th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36).

57 Bouwsma,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pp. 308-310.有關巴隆尼烏斯的史學，詳見：C. K. Pullapilly, *Caesar Baronius: Counter-Reformation Historia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5).

58 Bouwsma,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pp. 299, 304.

59 1603 年，威尼斯政府明令禁止在境內任意興建教堂；1605 年，限制俗人讓渡土地給教會，並禁止教廷在未獲威尼斯政府許可下監禁威尼斯的教士。有關此一爭議，詳見 Bouwsma,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pp. 342-347.

60 有關教廷與威尼斯之間「停止教權」的爭議，詳見 Bouwsma,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chap. 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問，發表文章為其立場進行辯護。沙比是一位修士，也是教會法學家與歷史家，主張俗世政府是上帝創造的神聖機構，地位同於其他教會機構，擁有無可置疑的權威性與自主性，否定教廷權威高於俗世政府的理論。[61] 1607 年，在法國調停之下，雙方爭議獲得解決：威尼斯交出 2 名因案被捕的教士，教廷保住了顏面，卻被迫默認威尼斯的政教自主權。

雙方爭議雖獲解決，餘波卻盪漾不已。1619 年，沙比出版《特倫特大公會議史》，從教會史的脈絡深入探討特倫特大公會議的合法性問題。沙比認為，教會是一個俗世制度，常因權力與財富兩大問題而導致腐化，而腐化又激起改革運動，兩者變成教會史的永恆課題。教會若想避免腐化，唯有揮別權力與財富，回歸初始教會的純樸，始有可能。[62]沙比批評，特倫特會議本是教會改革的契機，可惜教廷狃於權勢與財富，無意真正的改革，反而用盡各種操弄手法操控會議，變本加厲強化教廷權威。[63]從改革的角度看，沙比認為特倫特會議是一個失敗：在整個過程中，教宗處處算計、操弄，缺乏理想性，把教廷轉變為猶如一介專制王權，進一步扭曲了教會的原型。[64]

《特倫特大公會議史》是一部傑出的史著，在書寫上有不少突破人文主義史學之處。首先，沙比展現強烈的俗世主義，主張應以治俗世史的方法來研究教會，將人文主義史學導向更純粹的俗世史方向。[65]其次，沙比遵循嚴格的實證精神，堅持歷史的真實高於教條的正誤，因為歷史是「事實」問題，而非「權威」問題。他盡力搜集當代資料，累積個別

61 Bouwsma,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pp. 432-433, 540. 有關沙比的政治觀與宗教觀，參見 David Wootton, *Paolo Sarpi: Between Renaissance and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62 Bouwsma,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pp. 603-609.

63 Bouwsma,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pp. 611-618.

64 Bouwsma,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p. 618.

65 William J. Bouwsma, “Three Types of Historiography in Post-Renaissance Italy,” *History and Theory* 4, no. 3 (1965, Connecticut), p. 3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細節，認為撰史時不必為修辭的需要而犧牲細節的描述。[66]其三，沙比強調歷史本身的自主性，相信所有歷史真實都可從事件的內在結構去認知，而史家應從對人性的理解來探討歷史的動因。[67]在《特倫特大公會議史》中，沙比以塔西陀的手法，揭露此一神聖會議幕後各種邪惡的政治操弄與權力運作，與其顯現的世俗權慾與貪婪。[68]在探索歷史變化的心理動因上，沙比的分析比圭西亞狄尼深刻得多。

1736 年，法國神父庫拉耶（Pierre Francois le Courayer, 1681-1776）將《特倫特大公會議史》譯成法文，荷蘭《分類圖書評論》（*Bibliotheque Raisonnee*）隨即大幅連載摘錄。1762 年吉朋閱讀這些摘錄時，曾評論說：「對那些能超越宗派與黨派偏見者來說，這部著作乃是人類心靈史最奇特部分的宗教史的優秀傑作。」[69]然而，從史學史的角度看，沙比的表現只是義大利人文主義史學的迴光返照。隨著人文運動的北傳，歐洲史學重心逐漸轉到阿爾卑斯山北方的法國。

（四）從「理性的歷史」到「哲學的歷史」

16 世紀之前，法國並無類似義大利的人文主義史學，只有中世紀枯燥的年鑑。16 世紀初期，文藝復興越過阿爾卑斯山傳入法國，帶動法國的人文運動，也傳入新的歷史書寫形式。

羅伯・高庚（Robert Gaguin, 1433?-1501）與保羅・葉米利歐（Paolo Emilio, 1460-1529）將人文主義史學引進法國。高庚是一位修士，曾經赴義大利研究歷史寫作，返國後仿人文主義史學撰寫法國史，在 1495 年出版《法國歷史起源概要》（*Compendium de Francorum origine et gesis*），宣示法國史學新方向。[70]葉米利歐是義大利凡戎納（Verona）人，

66 Bouwsma,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pp. 593-595.

67 Bouwsma,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p. 593.

68 Wootton, *Paolo Sarpi*, p.106.

69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Murray, 1814), vol. 5, p. 303.

70 George Huppert,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Historical Erudition and Historical Philosoph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輕時到巴黎讀神學，任職於巴黎聖母院。1489 年，法國國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1470-1498）聘他擔任宮廷歷史家，替法國修史。葉米利歐從 1517 年起陸續出版《法國史》（*De rebus gestis Francorum*）10 書，涵蓋從起源到 1488 年的法國王朝史。他篩檢中世紀的史料，去除奇蹟與傳說，以連貫、條理的方式敘述法國歷史，展現出人文主義史學精神。[71]

到 16 世紀後期，法國學界對人文主義史學漸感不耐，嘗試推動新的史學，試探新治史方法。他們發覺人文主義史家雖然批評中世紀的年鑑，卻未能完全擺脫古典史學的窠臼。例如，葉米利歐仍然循古典史家的作法將法拉蒙（Pharamond）神話定為法國歷史的開端，不符合歷史探究的精神。領導這一波史學革新的是伊田．巴斯奎葉（Etienne Pasquier, 1529-1615）與藍斯洛．波培里尼葉（Lancelot Voisin de La Popeliniere, 1541-1608）。巴斯奎葉是律師兼人文學者，1560 年以法文出版《法國史研究》（*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跳脫年鑑式的敘事，改採專題方式探討法國歷史的起源、法律與風俗等課題。此外，巴斯奎葉更注意史實的精確，主張記註史料來源，有時甚至長篇地摘錄一手文獻。在他看來，歷史重建若不求精確即一無價值。[72]

波培里尼葉出身新教鄉紳家庭，受過古典與法律教育，曾參與法國宗教戰爭（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1594），最後回歸學術生涯，主要興趣是法國當代史。他在 1581 年寫了一部《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甚受歡迎；1599 年又出版一本《史學史》（*Histoire des histoires*），批評過往史學之缺陷，提出自己的史學理論。[73]《史學史》附有一篇〈完美歷史的觀念〉（“Idee de l’histoire accomplice”）的論文，提出「完美的歷史」（perfect history）理念。「完美的歷史」包含兩個焦點：一方面，史家應撰寫「通史」（general history）。波培里尼葉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 Renaissance Fran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0), pp. 14-15.

71 Huppert,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pp. 15-17.

72 Huppert,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pp. 32-36.

73 Huppert,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pp. 135-138.

評古代史家只寫「單一歷史」（simple history），只涉及歷史的單一面向，如軍事、政治等。他主張近代歷史家應撰寫通史，此種歷史的關鍵不在時間的短長，而在是否能陳述全部事物，包含社群的性格、風俗、習慣與生活方式等所有面向。[74]另一方面，史家須以「哲學的」態度來處理史料，要在雜亂的史料中看出意義，掌握事件背後的架構，解釋歷史變遷的原因。波培里尼葉強調，史家必須從事件的混亂中得到哲學的解放，將歷史提升為「哲學」。[75]

波培里尼葉主張的「完美的歷史」觀念，在諸多方面超越人文主義史學的陳規，明顯展現了哲學的歷史的輪廓。到 17 世紀中期，法國又出現「理性的歷史」（*histoire raisonnee*）學派，接續推進 16 世紀後期發展的新史學，向啟蒙時代「哲學的歷史」邁進。[76]

「理性的歷史」在歷史的題材、寫作形式與研究方法上，都進一步突破人文主義史學框架。在題材方面，人文主義史學偏向敘述可以提供政治、道德或宗教訓誡的重大史事，理性的歷史學派則擴大歷史書寫的面向，主張歷史的功用在於揭露行為動機、人群習俗與變遷動力，以呈現複雜的政治或道德實境。歷史家應探討具體事件、分析獨特情境，而非論述抽象道德原則，以提供讀者借鏡。除行為動機外，這個學派也主張探討影響人的行為的群體「精神」（esprit）與國族「習俗」（moeurs），以至整體文化的變遷，包括服飾、語言、法律、藝術，以及城市、教會與大學等。此外，史事的起源、因果與偶然性，歷史的運動、動力與變

74 Huppert,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pp. 138-144.

75 Huppert,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pp. 145-149.

76 這個學派的主要史家包括：Charles Sorel (1596?-1674), Pierre Le Moyne (1602-1671), Geraud de Cordemoy (1626-1684), Paul Pellisson (1624-1693), Isaac de Larrey (1638-1729), Abbe de Saint-Real (1639-1692), Charles Auguste La Fare (1664-1712), Pee Gabriel Daniel (1649-1728), Pierre de Lesconvel (1650?-1722), Francoisde Fenelon (1651-1715), 與 Henri Boulainvilliers (1658-1722)等。詳見 Phyllis K. Leffler, "The 'Histoire Raisonnee,' 1660-1720: A Pre-Enlightenment Gen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7, no. 2 (April-June 1976, Pennsylvania), pp. 219-2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遷等，也都是「理性的歷史」學派主張應書寫的課題。[77]

在寫作形式上，「理性的歷史」逐漸從強調文章的華麗，轉向著重事實的陳述。在路易十四（Louis XIV, 1643-1715 在位）時代古典主義影響下，「理性的歷史」學派主張歷史書寫應循「逼真性」（vraisemblance）原則，文字力求純樸、清晰與精確，以客觀、平衡態度陳述史事。在他們看來，人文主義史家講究文學技巧超過事實的精確，文章充斥著格言、辭藻、冗長演說、題外議論等虛飾筆法。他們則主張史家的職責應是洞察動機與原因，批判地還原史實，分析重要史料與輔助學科等。[78]

關於史學方法，「理性的歷史」特別關注歷史「真實」的性質與「證據」的可靠性問題。這個學派的史家認知到凡是人都無法避免主觀，但希望史家能克制個人的偏見，儘量保持客觀、平衡與公正的態度。除了史家的主觀，史料的可靠性也是通往真實的障礙。「理性的歷史」提出一些史料處理原則：原始見證價值高於二手記事或道聽途說，而記事遇到不同版本時，應採用可能性最高者。「理性的歷史」並進而建議，為精確判斷史料的價值，史家甚至要了解記事者本人、其習俗、政治與文化。[79]這是一個相當創新的觀念，類似現代史學主張的「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我們會在吉朋身上看到類似的主張。

從以上梳理可看出，「理性的歷史」已經具備十足「哲學的歷史」的精神與內涵。到 18 世紀，「哲學的歷史」觀念發展成熟，在前述史學發展的基礎上，形成「俗世的歷史」（Civil history）、「批評的歷史」（Critical history）與「普世的歷史」（Universal history）等三大歷史書寫的核心概念。[80]吉朋乃是這個新歷史觀念最重要的詮釋者和實踐者。

77 Leffler, “The ‘Histoire Raisonnee,’ 1660-1720,” pp. 222-229.

78 Leffler, “The ‘Histoire Raisonnee,’ 1660-1720,” pp. 230-233.

79 Leffler, “The ‘Histoire Raisonnee,’ 1660-1720,” pp. 233-236.

80 參見 Hugh Trevor-Roper,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History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John Roberts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吉朋論史實、真相與歷史再現

1761 年，吉朋發表他的處女作《論文學研究》（*Essai sur lsur ls de la Litterature*）。這部書的主旨是在替古典學術的價值進行辯護，但在辯護的過程中，吉朋有系統地討論到史學理論的問題，確立他對史學的基本看法。[81]吉朋的討論涵蓋史實、真相、史料解讀、理想的史著等幾個基本的史學議題。

（一）歷史家與歷史「真實」

吉朋在晚年寫回憶錄自述成為「羅馬帝國歷史家」的歷程。他下筆審慎，數易其稿，甚至沒有完稿。[82]回憶錄的開頭有一段自我告白：「真實（truth），赤裸裸、毫不掩飾的真實，本是比較嚴謹的史著的首要美德，應是這本個人自敘唯一值得推薦之處。」[83]這句話幾乎是前述西塞羅論述的翻版，透露出吉朋對歷史書寫的基本態度。

史家首要美德是追求「真實」，這是古典史學遺留、文藝復興人文學者傳述的史學觀念。「真實」或「真相」乃是抽象的概念，容易理解但難以具體掌握。那麼，史家撰寫歷史時，所謂「真實」其指為何？近代人文主義史學追求的「真實」，具體而言，是指敘事必須「精確」（accuracy）。吉朋自稱《衰亡史》一書係萃取自長期的古典閱讀，他對自己敘述的精確性相當有自信：「我的勤勉與精確，可以我自己的良心來作證。」[84]

吉朋視「精確」為史學的核心價值。1762 年，他讀到一本作者不明

81 Peter Ghosh, “Gibbon’s First Thoughts: Rome, Christianity and the *Essai sur l’Étude de la Litterature*, 1758-61,”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5 (1995, London), p. 152.

82 吉朋留下 6 個不完整的自敘手稿，收在 John Murray, *The Autobiographies of Edward Gibbon* (1896). 目前通行的吉朋自傳《我一生的回憶》（*Memoirs of My Life and Writings*），是其摯友兼遺囑執行人 Lord Sheffield 根據上述 6 個不完整稿本整合而來。

83 Gibbon, *Autobiography*, p. 1.

84 Gibbon, *Autobiography*, p. 180.

臺灣史研究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荷馬傳》（*Life of Homer*），這位作者在荷馬史詩裡梳理出一批符合歷史的元素，就率爾認定荷馬也是歷史家。吉朋嘲笑這位作者食古不化：「這位批評家為證明荷馬也是史家，先將歷史的要件精確分為：人、原因、時間、地點、工具、情感、行動與習尚等，再證明這位詩人在著作某處分別提到這些要素，最後確定他就是一個史家」，並諷刺其把歷史分割得如此瑣細，「卻忘了最重要部分：精確、客觀，還有很多」！[85]

吉朋撰史時謹守此一信念，敘述時力求精確。蘇格蘭歷史家羅伯森讀完《衰亡史》第 1 卷後，雖然對吉朋的文字有些意見，卻對他資料掌握的「精確」十分折服：「我多方比對他的引文（經驗教我懷疑我同道的精確），但發現他引用的文句，無一不是他親眼查過的。」《衰亡史》證明吉朋的勤學功夫，而「欠缺此一功夫，無人當得歷史家之名」。[86]

但是，史家撰寫歷史應如何才能符合「精確」的要求？在人文主義史學中，精確意指史家敘述史事時必須引證、檢視可靠的資料來源，吉朋也嚴守此一原則。1783 年，《衰亡史》第 1 至 3 卷合刊出版，吉朋在〈註腳說明〉中說明書中的資料引證原則：

> 勤勉與精確是一個歷史作者能夠攬給自己的唯二優點，假使執行一項必要的工作確實能獲取任何優點的話。因此，或可容我這麼說：我仔細檢視了所有可幫助說明我致力要處理之主題的原始材料。[87]

1788 年，《衰亡史》全部完竣後，吉朋在出版說明重申他總是「致力從源頭取得史料」：「我的好奇心，以及一種責任感，總是催促我去探討原始資料；假若原始資料有時候逃過我的搜尋，我也會小心翼翼地標出二手證據，信賴其真實而從中引用一個句子或一件事實。」[88]

---

85 Low, *Gibbon's Journal*, p. 174.

86 Gibbon,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 Robertson to Mr. Strahan. 15/3/1776,"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vol. 2, pp. 159-160.

87 Gibbon, "Advertisement to the Notes (1783),"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ix.

88 Gibbon, "Preface to the Fourth Volume of the Quarto Edition (1788),"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xi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撰寫《衰亡史》的過程中，吉朋常需仰賴一些精確、可靠的近代研究論著，特別是有關帝國後期到中世紀部分。法國古典學者提勒蒙（Louis-Sébastien Le Nain de Tillemont, 1637-1698）和義大利中世紀史專家穆拉多利（Lodovico Muratori, 1672-1750）是他引用最多的著者。提勒蒙出身冉昇派（Jansenist）教士，專長羅馬史和教會史，有《早期教會史》（*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與《羅馬皇帝史》（*Histoire des Empereurs*）兩鉅著。[89]穆拉多利是天主教教士，博學多聞，著作等身。吉朋大量引用其《義大利史籍彙編》（*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1723-1751）、《中世紀義大利古史》（*Antiquitates Italicae medii Aevi*, 1738-1743）與《義大利編年史》（*Annali d'Italia*, 1753-1756）。[90]

實際上，二手研究論著有時可能比原始資料清楚、精確。1763 年，吉朋讀義大利古史家納地尼（Fabiano Nardini, d. 1661）《羅馬古史蹟》（*Roma antica*, 1704）第 3 書，論及寫過古羅馬的作者，如維克特（Publius Victors）、盧福斯（Sextus Rufus）、翁努弗瑞烏斯（Onuphrius）、潘維尼烏斯（Panvinius）等。這些古代作者的優勢，吉朋觀察，在於曾親自見證過許多現今只能從書上得知的遺跡。儘管如此，他抱怨，「就精確這點言，他們的敘述實遠不如現代考證家的著作，後者須不斷訂正其錯誤，補正其缺陷，甚至指出其矛盾處」。[91]另一個例子是提勒蒙的《羅馬皇帝史》。吉朋對這部書的精確性有很高的評價，認為甚至優於原著：「要了解這部分的奧古斯都時代歷史，研讀這部如此博學和準確的編纂，遠比閱讀那些既無方法、也不準確、又欠文采、更乏年序的原著為

89 兩書的全名是 *Mé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s six premiers siècles*, 16 vols. (1693-1712) 和 *Histoire des empereurs et des autres princes qui ont regné durant les six premiers siècles de l'Église*, 6 vols. (1690-1697, 1701, 1738). 前者撰輯頭 6 個世紀的基督教會歷史，後者撰輯同一時期的羅馬皇帝歷史。

90 有關吉朋受穆拉多利的影響，參見 Denys Hay, "Muratori and the British Historians," in *Renaissance Essays*, pp. 94-98.

91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vol. 5, pp. 316-3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佳。我認為那些原著，還不如現存最差的修院編纂的年鑑。」[92]

值得注意的是，吉朋慣稱提勒蒙與穆拉多利兩位學者是他撰史時不可或缺的「嚮導」（guide）。《衰亡史》47 章根據提勒蒙《早期教會史》敘述 6 世紀初拜占庭教會的紛擾後，吉朋寫道：「從這裡，我必須完全離開這位舉世無匹的嚮導，他在宗教方面雖然偏執，卻由博學、勤勉、誠實、謹慎仔細等幾項優點完全平衡過來。」[93]他同樣稱穆拉多利是他「經常的與傑出的嚮導」、[94]「在義大利史方面的嚮導與老師」。[95]

吉朋何以稱這些他素所景仰的學者是「嚮導」？某種意義上，這反映他在處理證據時的審慎態度。「歷史家從近代作者的著作中找到古代史證據，並想將其寫入自己的敘述時，他應該要如何作呢？」吉朋認為一個稱職的歷史家：

> 他的職責，也是我一貫的作法，是去查證原始文獻，仔細審酌引用文句的用字、精神、脈絡與情境。而在我引用之前，它必須符合我自己聲明的，「我已經審慎檢視了可用來說明我要處理之課題的所有原始材料」。假若此一重要職責偶爾難以完全恪盡，我也僅省略我實際上難做到的部分。即便世上最大的城市，也仍欠缺這一有用機構：公共圖書館。[96]

再可靠的作者，史家在引證之前仍須以其作引導，循線查證所依據的原始文獻。吉朋對待穆拉多利《義大利編年史》的態度就是如此：「穆拉多利此書是以大師手筆，自由地運用、實際上是引用，自己編纂的那套 28 卷的義大利史籍大彙編。由於我的圖書館裡恰巧有這一套寶藏，我就

92 Low, *Gibbon's Journal*, p. 163.

93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5, p. 132, n. 76.

94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7, p. 216, n. 17.

95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7, p. 300, n. 110.

96 Gibbon, "A Vindication of Some 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vol. 6, pp. 591-5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去查證原文，即便不是視為一種職責，也當作一種消遣。」[97]只在少數情況下，吉朋沒有機會查證原始文獻，才會逕行「信任近代的嚮導的忠實，採用他們的證據」。即便如此，吉朋強調他也不會僅依恃他人的學術聲譽，仍會「審慎精確地指出我的閱讀範圍與資料來源」。[98]這是吉朋僅稱提勒蒙、穆拉多利等人是他的「嚮導」的主要原因。

（二）史實與歷史重建

歷史不是一堆零散、瑣碎的史料或事實，而是一個可以理解的完整敘述。在書寫實踐上，吉朋主張史家的基本美德是依據證據進行寫作：「一個作者想得到歷史家的美名，就必須參證各種原始證據。」在工作之初，史家必須收集與其主題相關的各種原始證據，再將證據整合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 每一項證據單獨看或許都是局部的和不完美的。藉由對這些零散材料作審慎、明智的重組與安排，他致力建構一個前後一致的有趣敘述。凡未經見證人證實之事，就不應放入敘述中；但他們的證據須緊密混融在一塊。我們不能期待其中每項證據都能成就整體之完美，那是不合理的，……但若撤除其中任何一個證據，我作的敘述有時就會有缺陷。[99]

史家建構歷史系統時，比較安全的作法是本諸「事實」，再由事實連結形成「系統」，而非演繹自「先驗的預設」。[100]吉朋在討論古典學術時即強調作為批評家的一份子，史家應當秉持「客觀與精確」的精神，只

97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7, p. 216, n. 17. 吉朋敘述 12 世紀以後的羅馬史或義大利史，主要即是依據穆拉多利的《義大利編年史》。

98 Gibbon, "A Vindication of Some 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 592.

99 Patricia B. Craddock, ed., *The English Essays of Edward Gibb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64.

100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Printed for T. Becket and P. A. De Hondt, in the Strand, 1764), pp. 101-1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服膺「理性或者事實的權威」：

> 真正的批評家有豐富的資料隨時待命，不會作錯誤的虛飾，不敢不讓最炫亮、似真的假設屈從在事實真相之下，也不敢以僅是臆測的語言對大師們高談闊論。身為一個公開宣稱支持事實真相的人，他會致力尋找與研究主題相干的證據，並且滿意地解決問題。[101]

即便地位崇高的學者，有時也須「膺服親身經歷的作者的證言，因他掌握了即時的細節」。[102]

歷史家應當根據事實而立論，吉朋強調，不能以「臆測當作真相、推理當作事實、可能性當作明證」。[103]《衰亡史》第 9 章述及古代日耳曼文明時，曾舉 17 世紀瑞典烏薩爾（Uppsala）大學醫學與語言學教授奧勞斯・路德貝克（Olaus Rodbeck, 1630-1702）為例，說明以傳說、臆測治史可能導致極其荒謬的結論。路德貝克帶有強烈的愛國主義偏見，意圖證明他的國家瑞典乃是古代文明中心：

> 任何在歷史或神話上獲得盛名的事物，這位激情的愛國人士總是歸源於他的國家。他主張希臘人是從瑞典（構成古代日耳曼相當大部分）獲得字母、天文學和宗教信仰。柏拉圖的亞特蘭提斯（Atlantis）、極北的勒相知土（Hyperboreans）、西方的金蘋果花園（Hesperides）、可愛的幸福群島，甚至死後的極樂世界，都不過是那塊令人愉悅的地方（在當地人看來）的不完美的摹本。只是上天如此垂愛的國度，不應在大洪水之後依然是荒原一片。[104]

路德貝克在 1679-1702 年間寫一本 3000 頁的《亞特蘭提卡》（*Atlantica*），吉朋指出，僅根據「傳說與口傳、臆測與語源學的吉光片羽」，就主張諾亞（Noah）的孫子亞實基拿（Askenaz）把族人「從巴比倫的通天塔（Babel）帶到地球的極端」，在瑞典繁衍之後再傳布到地球各角落：

---

101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49-50.

102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49.

103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50.

104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2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博學的路德貝克讓諾亞家族在幾年間從八人增長到兩萬。然後，他把他們驅散到較小的殖民地，在地球各角落繁衍。日耳曼或瑞典這個分支在執行這件偉大工作時異常地勤奮。這個北方的蜂巢把蜂群散布到絕大部分的歐洲、非洲和亞洲，如同血液從四肢流向心臟。[105]

在吉朋眼中，路德貝克是個飽學而輕信的學者，其建構的日耳曼古史體系雖然創意十足，卻經不起理智的檢驗。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羅馬大火傳言的記載，也可檢驗歷史家判斷力的高下。西元 65 年羅馬大火，羅馬大部分區域遭烈火肆虐，僅剩斷垣殘壁，景象一片淒涼。當時市井漫天謠言，指控皇帝尼祿（Nero, 54-68 在位）縱人放火燒毀自己的首都，甚至「有人嚴肅地傳播，更多人相信，尼祿享受、觀賞自己引起的災難，一邊彈七絃琴，一邊吟唱特洛伊毀滅的故事」。[106]尼祿是否真如傳言那樣一邊彈琴自娛一邊觀賞大火？古代史家對此事態度各異。比較塔西陀、蘇東尼烏斯與笛歐（Dio Cassius, c. 150-235）的說法，吉朋評論說：「我們可觀察到，塔西陀提及此一謠傳時帶著一種極恰當的懷疑與猶豫，蘇東尼烏斯則毫不遲疑地記錄下來，笛歐更鄭重其事地肯定其真實性。」[107]衡諸常理，吉朋以為這種謠傳「難以置信」，支持塔西陀面對這類傳言時抱持的審慎態度。[108]

（三）歷史家和他的史料

歷史書寫須以史料作基礎，但並非每個時代均史料豐富，能充分滿足史家的需求。史家應當具備發現史料的能力，要能從表面上看似無關

105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217.

106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p. 83-84.

107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84. n 30. 塔西陀在《編年史》第 15 卷 38 章。

108 塔西陀審慎的說：「因為外面傳說，正當羅馬起火的時候，他卻登上了他的私人舞台，而且為了用過去的災難來表示當前的災禍，他竟然歌唱起特洛伊被毀的故事。」見塔西佗著，王以鑄、崔妙因譯，《編年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下冊，15 卷 35 章，頁 5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材料篩出可用的史料。吉朋《衰亡史》第 17 章敘述 4 到 5 世紀——君士坦丁（Constantinus I, 306-337 在位）到狄奧多休（Theodosius I, 379-395 在位）——帝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制度等時，依據的不是一般史著，而是兩部官書：《狄奧多休法典》（*Codex Theodosiani*）與《帝國職官錄》（*Notitia Dignitatum*）。在吉朋看來，這兩部官書蘊藏有帝國後期狀況的豐富資料。[109]吉朋推斷《帝國職官錄》可能成書於西元 395 到 407 年間，內容記載帝國分治時東西部所有的官職與軍職，乃是了解帝國後期行政組織「有用的著作」。[110]《狄奧多休法典》形式上是一部法典，頒布於西元 438 年。「從各個角度看」，吉朋指出，這部法典可視為「4 到 5 世紀時帝國政治狀況的一個充分、豐富的寶庫」。這樣的典籍可當作歷史資料來使用，而非僅是單純的法律著作。[111]

第 4 和 5 世紀教會的教父，如熱羅莫（Jerome, 347-420）、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與克雷梭斯通（Chrysostom, 349-407）等的著作卷秩浩繁，歷史類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這些著作大都涉及神學論辯，雖不易引起讀者的好奇，卻可能隱藏有用的線索或具有價值的史實：「神學論辯者讓自己和對手陷入爭辯的烏雲，有時會陳述他反駁之異端的起源與發展；宣教士們高調批判奢侈之風時，描述了那些時代的習尚；當他們聲稱上天受到觸怒而降災示懲時，應時提示了某公共災難的存在。」[112]假若史家能花費同等功夫檢視一下論爭各方的發言，吉朋相信，他們應常會發現，「論戰一方刻意壓下或掩飾的段落，對手方在積極、利害交關的激情時，常會將之攤在陽光下」。[113]

假若確實找不到完整、可靠的證據，吉朋允許史家可以退而求其次，

109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158.

110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158. n. 73.

111 Gibbon, *Autobiography*, p. 172.

112 Gibbon, "A Vindication of Some 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 590.

113 Gibbon, "A Vindication of Some 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 5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利用較不完備的資料來拼湊歷史圖景。西元 41 年皇帝蓋烏斯（Gaius, 12-41，即卡利古拉〔Caligula〕）遇害，羅馬帝國中樞無主，元老院意圖政變以恢復其傳統權力。吉朋以嘲諷口吻描述元老院在這次政變中的處境：

> 在忍耐七十年後，元老院一度企圖取回久已忘卻的權利，卻以失敗收場。卡利古拉被謀害後，皇位空虛，羅馬兩位執政在卡庇托召集元老院開會，在會中譴責凱撒們的記憶，並對少數冷淡支持他們的軍隊呼喊「自由」口號，作了四十八小時自由共和國的領袖。但當他們尚在討論之時，禁衛軍已經作了決議，愚蠢的克勞迪烏斯業已在其營帳裡紫袍加身，準備以武力支持自己登基。自由之夢結束了，元老院一覺醒來，面對所有必然的奴役的恐怖。那個脆弱的議會被人民遺棄、遭軍隊威嚇，被迫批准禁衛軍的選擇，並痛哭流涕接受克勞迪烏斯的赦免。[114]

塔西陀的《編年史》敘述過這次政變，可惜這部分的文本早已佚失。吉朋找不到可靠的文獻以資引據，只好參考比較模糊的資料，勉力試圖重建：「非常令人惋惜，塔西陀處理此一史事的部分已經佚失，我們只好退而求其次，參照約瑟法斯（Flavius Josephus, 37-c.93）通行的傳說，及迪歐和蘇東尼烏斯的吉光片羽。」[115]吉朋對元老院這次流產政變的描述，筆下在同情中帶著嘲諷，明顯是模擬塔西陀的文字風格。

歷史家還可能遇到比這更差的狀況。西元 249 到 268 年，即皇帝德西烏斯（Decius, 249-251 在位）即位到咖列亞努斯（Gallienus, 253-268 在位）逝世期間，羅馬帝國災連禍接。「這段苦難時期，羅馬行省幾無片刻可以免於蠻族的入侵和軍隊的橫暴，殘破的帝國似乎瀕臨最後瓦解的關頭。」這期間帝國不僅災禍不斷，史料也極度缺乏：「時代的混亂與可靠史料的匱乏，予史家帶來同樣的困難，難以保全一個交代清楚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4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p. 71-72.

115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72, n. 35.

不間斷的敘述。」[116]在這種狀況下，史家應如何面對？吉朋的建議是：

> 面對斷簡殘篇，不是太過簡略，就是晦澀含糊，有時還矛盾百出，史家只能盡力蒐集、比較，有時還要靠臆測：雖然不能把臆測當作事實，然基於對人性的理解及其猛烈、無自制之激情如何運作的認識，在某些狀況下，倒是能夠彌補歷史材料之不足。[117]

面臨史料殘缺的窘境，吉朋以修昔底德的口吻，認為「基於對人性的了解」，史家有時可套用歷史上類似情境的記載來彌補史料的空白。[118]他曾以此法敘述西元 251 年「哥德之戰」場景。這年 11 月，羅馬人與哥德人在多瑙河畔小鎮梅西亞（Mæsia）展開激戰，「哥德軍隊拉成三線，但不知是刻意或偶然，第三線部隊前沿是一片泥濘的沼澤」。戰鬥開始不久，德西烏斯的兒子即在父親眼前遭亂箭射殺，皇帝強忍住悲痛，堅強地激勵哀戚的部隊以國家為重，繼續戰鬥。「那是場絕望對悲痛與憤怒的戰鬥，戰況可怖。第一線哥德軍最後不支瓦解，第二線前來馳援，遭到相同命運；只有第三線還保持完整，準備衝過沼澤。」[119]走筆至此，吉朋找不到這場戰鬥的史料，覺得可以套用塔西陀《編年史》中描寫羅馬人與日耳曼部族間「一場類似的戰鬥場景」，來描述梅西亞的戰況：[120]

> 在這裡，當天的運勢逆轉了！一切都轉而對羅馬人不利：這個地點污泥甚深，一踏即深陷，濕滑難以前進；他們的盔甲沈重，水深及腰；在這不利情況下，他們也無法擲出沉重的標槍。相反的，蠻族習於泥地戰鬥；他們個頭高，能夠將標槍投得老遠去刺傷敵人。[121]

116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237.

117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237.

118 修昔底德主張：人性乃是不變的，過去發生之事可能在未來的某一時刻會以類似方式重複發生。參見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上冊，頁 20。

119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249.

120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249, n. 50.

121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249. 這一段文字錄自塔西陀《編年史》第 1 書第 64 節，參見塔西佗著，王以鑄、崔妙因譯，《編年史》，上冊，頁 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吉朋接著寫道：「在這片沼澤中，羅馬軍隊經過一陣無功的戰鬥，徹底戰敗了，連皇帝都屍骨無存。這即是皇帝德西烏斯的遭遇！」[122]在寫作過程中，吉朋不只一次以類似手法來填補史料的空白。

（四）史家的信譽

西元 378 年 8 月，皇帝瓦倫斯（Valens, 364-378 在位）從哈德良堡（Hadrianople）出擊哥德人，在亂軍中戰死。吉朋《衰亡史》第 26 章敘述這段史事，主要的史源是希臘史家阿米亞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 c. 330-395）的《羅馬史》（*Rerum Gestarum*）。阿米亞努斯曾在羅馬軍中服役，後來投入歷史寫作。他師法塔西陀而撰寫《羅馬史》，刻意從西元 96 年開始寫起，以示銜接塔西陀《編年史》與《歷史》。《羅馬史》計 31 書，吉朋指出，其中「前面 13 書略述頭 257 年史事，現已逸失；後面 18 書涵蓋不過 25 年，仍舊保存他那時代豐富、真實的歷史」。[123]

阿米亞努斯是少數紀述 4 世紀史事的當世作者，文采固遠不及塔西陀，但吉朋仍覺得能秉持客觀公正態度，實在難能可貴。可惜《羅馬史》停筆於西元 378 年哈德良堡之役，其後的羅馬史再找不到這般公正的史書可資依循：「人們或許會指責他文筆有種種缺陷，或敘述雜亂無章；但現在我們必須告別這位客觀公正的史家，對此一無法挽回的損失深感遺憾，不忍心再予責備。」[124]吉朋也對阿米亞努斯後繼無人深感惋惜：

> 我感到最誠摯的遺憾，現在必須向一位準確與可靠的嚮導告別，他撰寫他那時代的歷史，卻未帶有通常會影響那時代人的各種偏見與激情。阿米亞努斯·馬策里納斯以皇帝瓦倫斯的戰死作為他那部有用史著的結束，將下一個更光榮統治時代的撰寫，託付給富有朝氣與

122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250.

123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p. 122. n 118. 有關阿米亞努斯的生平與史學概略，參見 Howatson and Chilvers, eds., *Oxford Concise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pp. 30-31.

124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p. 111. n 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才華的後起之秀。可惜這位後輩並未接受他的建議，或效法他的榜樣。[125]

這位「後起之秀」即是 5 世紀後期的卓西莫斯（Zosimus）。卓西莫斯也是希臘人，著有《羅馬帝國史》四書，從奧古斯都寫到 410 年西哥德人攻陷羅馬為止，其中第 2 至 4 書敘述第 4 世紀史事。[126]吉朋常徵引他的史著，但對其史學頗有批評：「卓西莫斯常以瑣碎與可疑的細節，褻瀆最嚴肅的敘述，暴露出判斷力的貧乏。」[127]為平衡卓西莫斯的偏見，吉朋只得「藉助殘缺的史料與紀事編年中殘存的蛛絲馬跡、詩歌或頌辭的比喻文字、還有教會作者不可靠的記載，來燭照卓西莫斯帶偏見的敘述」。卓西莫斯的偏見自然會干擾《衰亡史》的書寫，然在史料殘闕狀況下，吉朋也只好「踏著懷疑與戰戰兢兢的步伐，繼續前進」。[128]

羅馬帝國後期的史家喜歡誇大其詞，吉朋對此嘖有煩言。阿米亞努斯與卓西莫斯對 4 世紀後期帝國迫害巫術的記載是其例。373 年，皇帝瓦倫廷尼安（Valentinian, 364-375 在位，西帝）與瓦倫斯（東帝）在羅馬與安提阿（Antioch）同步進行巫術迫害。阿米亞努斯與卓西莫斯都記載了此事，吉朋《衰亡史》25 章根據兩者記載描述迫害的慘狀：年輕人與老年人上了腳鐐手銬，從義大利與亞洲邊區拖到羅馬與安提阿；許多元老、貴婦和哲學家在屈辱、殘酷的拷問中喪命；富裕之家在罰款與籍沒重壓下滅頂，無辜的公民則為求保命而顫抖。寫到這裡，吉朋表示：「我們或可從一位古代史家誇張的敘述來理解此一災禍幅度：在那些令人憎惡的省份，罪犯、流放者與逃犯構成人口大部分。」[129]吉朋雖參考阿米亞努斯與卓西莫斯的敘述，審慎的性格卻使他懷疑兩位史家的敘述「極可能誇大其詞」。[130]

---

125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p. 122.

126 Howatson and Chilvers, eds., *Oxford Concise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p. 575.

127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p. 129.

128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p. 122.

129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p. 18.

130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p. 18. n. 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吉朋還以拜占庭史家左納拉斯（Joannes Zonaras, 12 世紀）為例提醒史家的審斷須合常理。左納拉斯《歷史要略》（*Epitome of Historiaum*）敘述 3 世紀中期羅馬帝國與亞列曼尼族（Alemanni）的戰爭，提到皇帝咖列亞努斯一樁以寡擊眾的史事。根據左納拉斯，259 年咖列亞努斯曾親率 1 萬軍隊，在梅迪歐籃努姆（Mediolanum, 今米蘭）殲滅了亞列曼尼 30 萬大軍。以 1 萬之眾而殲滅 30 萬之敵，實在不合常理，吉朋質疑其可信度：「吾人可以將此一不可思議的勝利，歸因於歷史家的輕信或皇帝手下誇大戰果。」[131]他不止一次嘲諷左納拉斯喜歡不合理地誇大。《衰亡史》40 章敘述皇帝查士丁尼時拜占庭一次派系內鬥。當時「藍派」支持查士丁尼，綠派支持海帕提烏斯（Hypatius）挑戰帝位，查士丁尼頂不住壓力幾乎出亡。幸虧部將貝利撒留（Belisarius）與蒙都斯（Mundus）率領親信部隊救駕，襲擊困在競技場的綠派，「據統計，這天在冷酷無情、不分青紅皂白的殺戮中，超過三萬人被屠殺」。關於這次內戰死亡人數，史家記載不一：「馬策里納斯只籠統地說無數平民死於競技場。普羅科比烏斯估算死三萬人，而時間較晚的左納拉斯更從提歐芬尼斯（Theophanes）的三萬五千人，膨脹到四萬人。這即是誇張說法的一般發展進程。」[132]

此外，遇到立場偏頗、針鋒相對的記載時，史家應如何處理？386 年 10 月，羅馬軍隊在多瑙河擊潰東哥德人，吉朋《衰亡史》26 章敘述此一事件時，發現當時的史家充滿「激情與偏見」，對皇帝狄奧多休在這場戰爭中的角色，說法南轅北轍，難以調和：「一位帶偏見與惡意的歷史家，錯誤陳述狄奧多休的每項作為，斷言這位皇帝並未現身戰場，要到部將普洛摩多斯（Promotus）英勇的指揮擊潰蠻族大軍，才出來收割戰果。另一位曲意奉承的詩人，在霍諾留斯（Honorius, 395-423 在位）宮廷中寫詩讚揚先帝和其子的光榮事蹟，則將勝利歸功於狄奧多休個人的英勇，甚至幾乎暗示是皇帝親手宰了東哥德國王。」遇到這種針鋒相

131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259.

132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4, p. 226, n. 54.

臺灣人文與醫療史期刊專用

對的記載，吉朋提醒史家須以審慎的態度，審視各方說法，試圖「在極端與矛盾說辭之間的平衡處，找到歷史的真相」。[133]

三、吉朋與「哲學的歷史」

（一）哲學、批評與歷史

蘇格蘭傳記作家詹姆士・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 1740-1794）在著名的《約翰笙傳》（*The Life of Dr. Johnson*）中，記錄一次他與大文豪約翰笙（Samuel Johnson, 1709-1784）的對話，主題是「閱讀歷史之用處」，時間是在 1775 年 4 月，吉朋也在場。包斯威爾記載：

> 約翰笙說：「我們必須考慮，實在只有非常少的歷史！我是說，真正真實的歷史。有關某些國王統治過，或某些戰爭發生過，這些我們可以相信是真的；但是所有其他增添的修飾、全部的歷史哲學，都不外是臆測。」
>
> 包斯威爾回說：「那麼，先生，你會把所有歷史都化約成只不過是年鑑，一個依年代次序記錄顯著事件的大事記。」[134]

約翰笙這裡應是在批評當世歷史寫作過於強調修辭與論述，而輕忽歷史真實的弊病。根據包斯威爾，時正在撰寫《衰亡史》的吉朋也在現場傾聽兩人的對話。包斯威爾記錄他的反應：

> 吉朋先生也在座，當時他應正在積極撰寫他的歷史，並於次年出版第一卷。但他並未挺身而出為那一種寫作進行辯護。他可能不願向約翰笙表達心中的想法。[135]

吉朋顯然不會認同約翰笙的議論，至少不會接受歷史可去除「修飾」或

133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pp. 128-129.

134 James Boswell, *The Life of Dr. Johnson* (London: J. M. Dent & Son, 1933), vol. 1, pp. 558-559.

135 Boswell, *The Life of Dr. Johnson*, vol. 1, p. 5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史哲學」的說法。不過，他當場並未表達意見，只對約翰笙的闊論保持沉默。吉朋那時尚非英格蘭文人圈的一號人物，不願在大師面前為史學辯護，或許是怕受到約翰笙的嘲諷。

約翰笙是著名的批評家，博學多聞，對事物多有獨到的見解，自然不會天真地認定歷史「只不過是年鑑，一個依年代次序記錄顯著事件的大事記」。[136]但約翰笙對史學的知識層次懷抱偏見卻是事實，他在另一個對話中說：

> 作一個史家毋須種種了不起的能力；撰寫歷史時，人類心智所有最偉大的力量是靜止的。他手中握有事實備用，是以不必動用創意。不要求任何高層次的想像力，至多僅需像最次等的詩歌那樣即可。只要一些洞視、精確性與修飾，並發揮得當，即可勝任。[137]

約翰笙這個評價並非獨特，那是啟蒙知識界對史學的普遍看法。啟蒙哲士達冷柏（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在《百科全書導論》（*Discours preliminaire a l'Encyclopedie*）中，將人的心智能力分為推理、想像與記憶，從推理而有哲學，從想像乃有文學，從記憶遂有史學。在啟蒙哲學的認識論中，記憶是在人類心智能力的最下層。針對此論，吉朋本人曾著書辯駁，申明古典研究不僅需要記憶力，也能磨練人的推理力。[138]約翰笙的確未將歷史的知識層次看得太高，但他認為史家應具備「洞視、精確性與修飾」三項能力，尚屬中肯之論。不過，吉朋似乎對 1775 年那場交談耿耿於懷，後來在寫《衰亡史》第 64 章時，逮到一個機會，回擊約翰笙：

> 在一期《漫遊者》（*Ramblers*）中，約翰笙博士讚美諾爾斯是一等一的史家，只是選題不當。然而，我不禁懷疑，一部編纂自拉丁作者、偏頗又冗長的著作，一千三百頁中盡是戰爭與演說，能給予一

136 有關約翰笙的歷史觀，參見 John A. Vance, *Samuel Johnson and the Sense of Histor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

137 Boswell, *The Life of Dr. Johnson*, p. 263.

138 有關這個辯論，詳見楊肅獻，〈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頁 143-1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個啟蒙的時代多少教導或娛樂？這個時代需要富於哲學與批評精神的歷史家。[139]

諾爾斯（Richard Knolles, 1545-1640）「態度偏頗、文字冗長」，寫作充斥「戰爭與演說」，顯然仍屬於人文主義史學的陳舊風格。吉朋批評諾爾斯的史作欠缺「哲學與批評精神」，是站在啟蒙時代的立場，表達不同的歷史觀念。

與約翰笙相較，法國文豪伏爾泰（Voltaire; 本名 Francoise-Marie Arouet, 1694-1778）是另一種類型。伏爾泰大約與約翰笙同時，但對歷史的認識截然不同。如果說約翰笙排斥「增添的修飾」與「歷史哲學」，伏爾泰則對「某些國王統治過」或「某些戰爭發生過」這類題材不感興趣。他曾批評歐洲傳統史書「印滿各種條約，冠冕堂皇的加冕禮、教士接受四角帽典禮、甚至大使的晉謁，都鉅細靡遺地敘述，連門房、僕從都沒有遺漏」。這類內容對讀者毫無啟發的效果：「讀過三、四千個戰爭經過和幾百個條約內容後，我發覺我的頭腦壓根沒有更明白。」[140]他在《路易十四時代》（*Le Siecle de Louis XIV*, 1751）一書中展現了新的歷史寫作風格。

在《路易十四時代》的序中，伏爾泰指出過去的事並非全都值得一寫，史家寫作時須依照著作的目的進行選擇。他對戰爭的繁瑣細節不感興趣：「這些城池被交戰雙方軍隊反覆爭奪，又根據條約時而割讓，時而歸還。千百個對當代人說來饒有興味的情節，在後世人眼裡都煙消雲散，消失淨盡。其結果是只讓人看到決定各個帝國命運的重大事件。」《路易十四時代》一書只敘述「值得各個時代注意，能描繪人類天才和風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勸人熱愛道德、文化技藝和祖國的事件」。[141]換言之，這部歷史不是要表彰路易十四「個人行動功業」，而是在描繪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9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7, p. 24, n. 66.

140 Voltaire, *Nouvelles considerations sur l'histoire*, cited from J. F. Lively, ed.,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Longmans, 1966), p. 75.

141 伏爾泰著，吳模信等譯，《路易十四時代》（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 10。

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面貌」。[142]

吉朋曾在 1762 年閱讀《路易十四時代》，對伏爾泰的史學風格作了一些評論。根據他的考察，伏爾泰撰寫歷史時，本人不會去翻遍「發了霉的修院作者的著作」、動手動腳找材料。他不強調新史料的發掘，通常只以一些「現成編纂」作基礎，而「以其風格的魔力將其粉飾一過，製作出一齣非常適意的、浮面的、不精確的演出」。不過，吉朋強調，伏爾泰並非不重視資料；事實上，只要是他接觸得到的史料，無論文字或口傳，他「似乎都會盡力去查閱」：

> 他雖欠缺偉大史家的磅礴氣勢，卻能把各種史實收納在一部兩小卷的書中，並以一種輕鬆、清晰與活潑的筆調，予以敘述。他還有一個優點，能捨棄所有枝微末節，且他敘述的事件，若不是有用或有趣，一概不選。[143]

早期的啟蒙史家關注書寫風格的活潑與觀點的創新，並不特別講究史料的充分與事實的精確，伏爾泰與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都有這項特色。

約翰笙與伏爾泰對歷史的看法是兩個極端。從吉朋對兩者的回應，可以看出他對史學的看法應就在兩者的中間。

（二）哲學的歷史

吉朋主張一個歷史家必須具備「哲學與批評的精神」，能寫作符合啟蒙時代精神的歷史。這種新的歷史，是一種俗世的歷史、一種批評的歷史與一種普世的歷史，換言之，是一種「哲學的歷史」。

1. 俗世的歷史

「哲學的歷史」首先是一種「俗世」的歷史觀，主張從俗世或理性的角度來書寫或討論歷史變遷。近代早期歐洲史學的俗世化，包含兩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2 伏爾泰著，吳模信等譯，《路易十四時代》，頁 5。

143 Low, *Gibbon's Journal*, pp. 129-130, “Aug. 30th, 1762.”

層面：一是「聖界史」與「俗世史」的分離，一是歷史解釋從「神佑論」轉向「自然因果論」。

近代歐洲史學在發展過程中出現「聖」（sacred）與「俗」（civil）分化。1605 年，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討論學問分類，將歷史分為「聖界歷史」、「俗世歷史」與「學術歷史」；[144] 1638 年，義大利學者托瑪叟・康班內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將歷史分為「聖界歷史」、「自然歷史」與「俗世歷史」。[145]到 18 世紀，神聖與俗世史的分流已經普遍了。蘇格蘭人錢伯斯（Ephraim Chambers, c. 1680-1740）的《百科全書》（*Cyclopedia*, 1782），把歷史分為「聖界歷史」、「自然歷史」與「俗世歷史」，並解釋「聖界歷史」敘述「宗教的奧秘與儀式、神的異象和顯靈等事務」，而「俗世歷史」則是敘述「人群、邦國、共和國、社群、城市等」。[146]從人文主義史學到哲學的歷史，俗世的歷史構成近代歷史寫作的核心。

在這過程中，歷史解釋也發生重要變化，中世紀基督教的神佑論逐漸被俗世的自然因果論取代。這一種轉變萌芽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史學：馬基維利率先從基督教「神佑論」轉向古典異教的「幸運說」，而圭西亞狄尼則進而從「幸運說」轉向自然式的「心理動機」說。17 世紀法國的理性史學更趨向俗世的解釋，而 18 世紀的啟蒙史學更完全從人的作為本身尋找歷史的動因。孟德斯鳩分析羅馬統治的成敗時指出：「支配著全世界的並不是命運。這一點從羅馬人身上可以看出：當羅馬人根據一種辦法來治理的時候，他們一連串的事情都是成功的，可是當羅馬人根據另一種辦法來動的時候，他們就遭到了一連串的失敗。」[147]對孟德斯鳩來說，羅馬統治之成敗與命運無關，完全在「統治方式」的變動。

144 Francis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Dent, 1915/1962), p. 69.

145 Donald Kelley, ed., *Version of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nlighte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75.

146 Ephraim Chambers, *Cyclopedia; 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 (London: J. and J. Knapton,1728), vol. 1, p. 252.

147 孟德斯鳩著，婉玲譯，《羅馬盛衰原因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2005），頁 1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學俗世化的結果之一是把基督教看作一種「俗世制度」。17 世紀初，沙比即把教會當作俗世機構來論斷。1762 年，吉朋研讀沙比《特倫特大公會議史》，深受其影響。早在洛桑時期，吉朋即接觸了一些批評教會的著作，如巴斯葛（Blaise Pascal, 1623-1662）與那不勒斯史家賈農（Pietro Giannone, 1676-1748）。巴斯葛是一位神學家與哲學家，在《鄉村書簡》（*Provincial Letters*, 1656-1657）中抨擊教會學者的「決疑論法」（casuistry），諷刺教會以律法來論斷行為的正與邪。巴斯葛擅長以幽默、嘲弄、諷刺的手法進行論證。吉朋從《鄉村書簡》學到如何「運用諷刺手法，來處理嚴肅的宗教課題」，[148]賈農的《拿不勒斯史》（*The Civil History of Naples*）教吉朋如何「以批判的眼光考察中古教權的進展與弊端」，[149]這些能力都在《衰亡史》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1776 年《衰亡史》上市後，吉朋在宗教上的「不敬」馬上引起矚目，書中第 15 章有關基督教興起的討論甚至引起一場不小的論戰。吉朋在《衰亡史》中常以諷刺但文雅的筆調，議論宗教的課題，無論是古典異教或帝國時代的基督教，都難逃他的嘲諷。例如，他評論羅馬帝國初期的宗教寬容政策：

> 皇帝和元老院的宗教政策，同樣得到開明意見者與迷信習俗者的欣然奉行。各種宗教儀式在境內流行，對一般民眾而言，是同樣的真實，對於哲學家來說，是同樣的虛妄，對地方行政官來說，是同樣的有用。[150]

這段文字似乎是站在客觀立場說明羅馬政府的宗教政策，但語氣中帶有嘲弄的味道。又如，他在第 15 章質疑教會史記錄的奇蹟問題，假裝以不可置信的語氣說：

> 多少有點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克萊爾沃（Clairvaux）的聖伯納記錄了友人聖馬拉奇（St. Malachi）很多神蹟，卻從來沒有提及他自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8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5.

149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6.

150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45.

> 的神蹟。而和他相關的神蹟又輪由他的朋友和門徒細心的記述。在綿長的教會歷史上，可找得到一位聖徒很肯定的說出自己擁有神蹟的能力嗎？[151]

教會史上記載有許多神蹟發生在聖徒身上，但吉朋覺得奇怪的是，發生在聖徒身上的神蹟，往往是朋友或門徒記載的，從來沒有一個聖徒把自身遇到的神蹟記錄下來。這裡，吉朋懷疑宗教神蹟都起自後人的附會，語氣中帶著揶揄，巴斯葛式的手法明顯可見。

吉朋是以何種態度處理基督教興起的課題？在 18 世紀，基督教仍是歐洲社會的敏感議題。吉朋自然理解對宗教問題須「懷抱適切的誠心」，但仍堅持歷史家應以「客觀公正的鐵律」進行「坦誠而理性的探究」。[152]他強調歷史家與神學家有不同關懷。傳統神學家「樂於將宗教描寫成是從天而降，以裝飾其原本的純潔」，歷史家則有比較嚴肅的任務，要「揭露未蒙受福音啟示的教師與信徒的缺陷」、「找出長期落居地上的宗教，處在一群心智不堅與墮落的人類中，不可避免會犯的錯誤與腐化」。[153]這裡可看到沙比《特倫特大公會議史》的精神。

在《衰亡史》第 15 章，吉朋討論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取得重大勝利的因素。關於這個議題，神學家習慣訴諸「第一因」，將其「歸功於教義本身的說服力與偉大作者主宰的神佑」。在吉朋看來，這種解釋失之空泛，現實上「真理與理智很少如此容易就被接受」，他傾向將基督教視為一個歷史的宗教，而討論促成其快速成長的「第二因」（secondary causes）。從自然的角度，吉朋歸納出五項原因：其一、基督徒是靠一種固執、不寬容的激情來維持信仰；此一激情源自猶太教，因基督徒狹隘與反社會的精神而強化。其二、擁有來世的信仰，以及強化此一信仰的事故。其三、初期教會被認為擁有法力，可施行神蹟，吸引教外人士入教。其四、基督徒純潔而嚴謹的德行。其五，基督教的團結與紀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1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30, n. 80.

152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2.

153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p. 1-2.

漸在羅馬帝國核心地區形成一個獨立的王國。[154]這是一種完全俗世化的處理手法。

2. 批評的歷史

哲學的歷史也是一種「批評的歷史」，它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這是指史家應以實證精神考證史料，確定史實的精確，以書寫「真實的」歷史；另一方面，它不接受歷史只是堆積史料、描繪細節，而要進而解釋因果，建立有理路、系統的完整敘述。[155]有關前一個課題，本文在其他地方已作討論，此處將聚焦討論吉朋的歷史因果論。

「因果關係」是哲學的歷史的重要議題。《論文學研究》討論「因果關係」時，吉朋作一個比喻：「歷史之於一個哲學的天才，就如牌局之於當諾侯爵（Philippe de Courcillon, Marquis de Dangeau, 1638-1720）。他看出一個系統、規律與關聯，別人卻只看到變幻的機運。對哲學家而言，歷史知識就是因果關係的知識。」[156]這是一個有趣的比喻。當諾侯爵是路易十四時的紙牌專家，當世無人能及，他精通牌理，以「理性的計算」精神，用數學機率與平均數概念，估算出牌狀況，結果總能以技巧戰勝機運。當諾因擅玩紙牌而獲路易十四的青睞，進宮廷服侍國王，後來更扶搖直上，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157]

吉朋以牌局來比喻歷史，是要說明：歷史從表面上看，似乎事實零碎雜陳，內部其實存在著「系統、規律與關聯」，就如同牌局看似變幻莫測，其間仍有規律或頻率可循。一個明智的歷史家要有當諾的機靈，能從變幻多端的史實中梳出歷史發展的理路、結構與因果。在吉朋看來，歷史知識乃是探討因果的知識，而非僅是瑣碎的紀事。

吉朋界定「哲學的歷史」為探討「因果關係的知識」，這在知識論

154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2.

155 Trevor-Roper,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p. 2.

156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98-99.

157 Gerda Reith, *The Age of Change: Gambling in Wester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67-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符合 18 世紀對「哲學」與「歷史」兩個概念的理解。約翰笙編的《英語辭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歷史」一詞是指「事實與事件的知識」，而「哲學思維」的一個解釋則是「探究因果」。[158]錢伯斯在《百科全書》「哲學」條解釋：「哲學一詞意指事務的理由的知識，與意指單純事實知識的歷史正相反」；而「哲學的」一詞的一個解釋是「發現物理結果的物理原因」。[159]「哲學的」歷史不能只是堆積史實、描述歷史的表象，而必須進入歷史的裡層，掌握歷史的動力，探究歷史變遷的因果。

18 世紀「因果關係」有一討論重點：人的行動是由「機遇」主導或由「必然性」決定？在《論文學研究》中，吉朋考察兩種針鋒相對的觀念。有一種人擅長體系思考、好作臆測，常將「自由犧牲給假說」。他們恆在偉人行動中看出圖謀，在其性格中找到主導原則；而理論的心智使其相信「無論在思辨或行動上，人類一般而言都是有系統的」。相對的，一些智能平常者則「把計謀從道德世界完全排除，而以偶發補其位」。他們相信智弱者之行動都起自任意：「一個狂人的暴怒，可以拔掉帝國棟樑，而一介婦人的軟弱則可將之傾倒。」[160]兩種立場雖然大相逕庭，卻都將歷史動因歸諸個人行動的結果。

受到孟德斯鳩影響，吉朋建議跳脫個體的「特殊」原因，轉向探究群體的「一般性」（general causes）原因。吉朋所說的「一般性原因」其指為何？休姆在〈論藝術與科學的興起與進步〉一文中，以一個原則區分「機遇」和「因果」：「凡是靠少數人的事，很大程度上都可歸諸機遇，或是靠神秘和難明的原因；而凡是起自大量人群的事，則常可以確定的與可知的原因說明。」[161]休姆所說從群體產生的「因果」應即是

158 Samuel Johnso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ed. Alexander Chalmers (London: Studio Editions Ltd., 1994), pp. 352, 549.

159 Chambers, *Cyclopedia*, vol. 2, p. 230.

160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98-99.

161 David Hume,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London: Henry Frowde, 1903), p. 1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吉朋的「一般性原因」。

吉朋對「一般性原因」的討論主要受到孟德斯鳩的影響。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孟德斯鳩說：

> 有一些一般的原因，它們或者是道德方面的，或者是生理方面的。這些原因在每一個王國裡都發生作用，它們使這個王國興起，保持住它，或者是使它覆滅。一切偶發事件都是受制於這些原因；如果偶然一次戰敗，這就是說一次特殊的原因摧毀了一個國家，那就必然還有一般的原因，使得這個國家會在一次戰鬥中滅亡。總之，一個總的基礎是會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帶動起來的。[162]

吉朋循這種說法，強調特殊原因無法獨立運作：「『特殊』原因儘管影響廣泛，然效果必然會受侷限，且它也主要只是展示在一般事件中。」[163]

吉朋推崇孟德斯鳩處理歷史因果問題的明智方式。他發現孟德斯鳩「會展示這些原因在帝國興衰上是如何運作的；它們會依次以偶發事件、審慎、勇氣、甚至怯懦的面貌出現；它們的運作毋須特殊原因的支持，有時甚至與其直接對立」。這些一般的原因「緩慢而確定的運作，不知不覺中改變了事物的面貌，特別是宗教、習尚、與任何立基在輿論上的事物。」由是，吉朋驚嘆，「一般性原因理論」在孟德斯鳩手上會變成一種「關於人的哲學的歷史」。[164]

3. 普世的歷史

「哲學的歷史」更是一種「普世的」歷史，展現在書寫時空的擴大與題材的多元。在歐洲史學中，「普世史」觀念的源起甚早，可追溯到古代希臘史家希羅多德與波力比烏斯；[165]兩位古代史家撰寫的歷史都涵蓋其已知世界的全部，波力比烏斯甚至主張整個世界的歷史應形成一個

162 孟德斯鳩著，婉玲譯，《羅馬盛衰原因論》，頁 102。

163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13.

164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113-114.

165 Donald Kelley, ed., *Faces of History.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機的整體。[166]到古典後期，從尤西比烏斯（Eusebius, 260/265-339/340）以降的教會神學家與歷史家，精心地將古典的普世史概念轉化成基督教的普世史觀念，並在中世紀以後構成「世界年鑑」（universal chronicle）紀事的基本架構。

根據基督教史觀，歷史乃是神意的展開，並循著「四王國」（Four Monarchies）或「六時期」（Six Ages of the World）的階段發展。又因神意只賜福基督徒，故中世紀史家只寫基督教世界的歷史，而不及於神意計劃以外的地區。到文藝復興以後，此一歷史架構逐步受到挑戰。佛羅倫斯史家布魯尼首創以「古代」、「中古」、「近代」的斷代架構，取代「四王國」或「六時期」的分期架構，這個新歷史架構跳脫基督教世界的框架，能夠納入非基督教世界的歷史。[167]海外大發現以後，歐洲人視域擴大到美洲與東方，增添了史學的題材。

哲學的歷史家通常是以普世的精神來撰寫歷史，伏爾泰的《風俗論》（*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1756）是其典型。這部鉅著全 197 章，以普世史架構敘述世界文明的發展，題材上突破傳統政治與軍事題材，強調各國習俗與社會發展，凸顯藝術與科學成就。[168]蘇格蘭史家羅伯森以另一種方式來展現普世史的精神。羅伯森並不是寫一部類似《風俗論》的整合性世界史，而是先後出版《蘇格蘭史》（1755）、《查理五世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Charles V*, 1769）、《美洲史》（*The History of America*, 1777）與《古印度史論》（*A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Concerning the Knowledge Which the Ancients Had of India*, 1791），歷史視野廣闊不下於伏爾泰。

吉朋《衰亡史》寫的雖是羅馬帝國的衰亡，但架構上與精神上是普

166 波力比烏斯的普世史觀念，參見華班克（F. W. Walbank）著，翁嘉聲譯，〈英文版導讀〉，收入波利比烏斯（Polybius）著，翁嘉聲譯，《羅馬帝國的崛起》（新北：廣場出版，2016），頁 xiv。

167 Trevor-Roper,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pp. 2-3.

168 有關伏爾泰的史學，參見 J. H. Brumfitt, *Voltaire: Histor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esp. pp. 61-70, 76-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的。《衰亡史》時間上跨越 1300 年，涵蓋兩個羅馬帝國的衰亡史，書寫架構之宏大，觸及人群與文化之眾多，超越古今任何史家。《衰亡史》雖然以政治史與軍事史作為敘事主軸，但也常深入宗教、社會、經濟、文化等議題。《衰亡史》第 9 章對日耳曼民族的起源、社會與文化的探究，第 15 章有關基督教興起的討論，第 44 章對羅馬法律源流與發展的分析，都是顯著的實例。吉朋大量利用 17 世紀以來歐洲東方學家的研究，讓匈奴人（26 章）、突厥人（42 章）、塞爾柱人（57 章）、阿拉伯人（50 章）與蒙古人（64 章）等，在他的敘述架構中都有一席之地，更足以說明其歷史視野的廣闊。

哲學的歷史在書寫題材與對象方面展現了普遍性。和法國「理性的歷史」主張的「普遍史」一樣，啟蒙時代普世史強調照顧人的全部活動面向，並書寫「全人」的歷史。伏爾泰曾問：對啟蒙的「公民和哲學家」來說，歷史須怎樣書寫才恰當？這類讀者不會關注政治、軍事、人物、條約等傳統課題，他寫道，而「寧可要了解」：

> 一個國家在發生戰爭前有何資源，而戰爭是增加或減少它的資源？西班牙征服美洲前是否比今日更富裕？查理五世（Charles V）時西班牙人口規模比菲律普二世（Philip II）時期大多少？兩百年前阿姆斯特丹人口何以幾乎不到兩萬？英格蘭目前人口比亨利八世（Henry VIII）時代大多少？

歷史家不僅考察社會與經濟變化，也要探索導致變化的原因：

> 一個國家曾經有過什麼根本的弊病和主要的優點；為何它在海上曾經強盛或衰弱；出口的紀錄可以告訴他這些。他會想知道技藝與製造業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他會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跟隨著它們向前或向後擺動。最後，習尚與法律的變遷將是最重要課題。[169]

哲學的歷史應超越上層政治與軍事課題，轉而關注經濟與社會的變動，甚至習尚與法律的變遷。如伏爾泰所說，現代史家要寫的不是關於「國

169 Voltaire, *Nouvelles considerations sur l'histoire*, pp. 75-76.

王與宮廷少數人的歷史」，而是關於「所有人的歷史」。[170]

吉朋受孟德斯鳩與伏爾泰的影響，重視法律、風俗、地理與氣候等題材。他宣稱：「我要以一個哲學家的眼光，檢視一個國家的內部與其居民的風俗，自然與人為的產物，部落的遷移、法律與性格。在眾多有趣的課題中，我會抓住機會探討到底地方的地理與氣候如何影響到公眾事務與風俗。」[171]史家要研究一個民族的起源與早期社會情況。在《衰亡史》第 9 章，吉朋評論塔西陀《日耳曼志》指出：「塔西陀是第一個以哲學的思維來研究史實的歷史家，他以敏銳的眼光考察日耳曼人，以生花妙筆描述他們純樸、獨立的原始狀態。」[172]他也推崇塔西陀有關羅馬法律起源與演變的考察。《衰亡史》第 16 章，吉朋論及塔西陀對早期基督教的敘述：「編年家的職責是去採用當時人的敘述；但哲學家自然地自己會去描述這一新宗派的起源、發展與性格。」[173]一個哲學的歷史家，必須以「哲學的思維」來探討史實，深入史實表面，討論其「起源、發展與性格」。

（三）哲學的歷史家

吉朋在《論文學研究》中曾討論一個稱職的史家應具備的才華。他的討論從史家鑑別史實的能力切入。吉朋認為，撰寫歷史時，如何甄別可作為立論原則的史實是一件難事：

> 一個歷史家的疏忽或不好的識見，有可能為了讓我們的耳朵充滿戰爭的喧囂，卻永遠失去一個上好的細節。假使哲學家並非總是歷史家，至少希望所有的歷史家都是哲學家。[1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70 Voltaire, *Nouvelles considerations sur l'histoire*, p. 76.

171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vol. 5, p. 430.

172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189.

173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87.

174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106-107.

歷史家須具有優良識見，才能辨識史實的不同價值，而不致漏失任何「上好的細節」。職是之故，吉朋期望「所有的歷史家都是哲學家」，即便「哲學家並非總是歷史家」。

在 18 世紀，「哲學家」一詞指的是能夠以理性、科學的精神探究事物本源的學者。一個哲學家專業上可能是數學家、音樂家、考古家，他們雖然處在不同崗位，因能「哲學地」思維，故仍是哲學家。而如吉朋所說，他們因「有能力掌握其技藝的根本原則，遂能超越其他匠師之上」。從這一角度看，古羅馬文學家西塞羅、歷史家塔西陀，近代哲學家培根、數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 1646-1716）、批評家貝爾（Pierre Bayle, 1647-1706）、文學家封騰內爾（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 1657-1757）與思想家孟德斯鳩等，都是這一意義下的「哲學家」。[175]

那麼，一個「哲學的歷史家」需具備什麼才華？這須從哲學的歷史角度來考察。

在 18 世紀，哲學的歷史學強調：歷史書寫必須超越由紛雜事實構成的毫無意義的傳統年鑑，找出隱藏在重要史事背後的原因，以達到解釋的目的。[176]易言之，歷史家要能夠梳理史實，化繁為簡，找出當中的連結，建立因果關聯，從而形成一個系統的敘述。要具備這項能力，史家須有哲學思考的訓練，養成歸納與綜合的能力。吉朋指出：「一個哲學的天才，在於其有回歸到最簡單觀念的能力；在於其能夠找出事物的根本原則，並進行聯結。」史家一旦具備這種辨識力，就擁有一個「銳利又寬闊」的眼界；如此，他就可「站在一個制高點」，綜覽眼中的史實，從其中「形成一個精確、嚴謹的觀念」。吉朋也觀察到，許多人都有能力精確形成一些個別觀念，但是僅少數人能用抽象觀念來疏理其他觀念間的各種連結，而「能夠形成普遍原則的更少」。這些天賦次等者雖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75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89-90.

176 David Carrithers, “Montesquieu’s Philosophy of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7, no. 1 (January-March 1986, Pennsylvania), p. 61.

有能力精確辨識其所見，但因視界的侷限，只看到全局中的一部分。[177]

哲學的歷史家要能夠評斷事實的適當價值。歷史事實多元而龐雜，但並非都有同等的重要性。一個哲學的歷史家要有能力辨識事實價值，方能妥善運用以建立適當的歷史敘述或解釋。

根據證據的價值，吉朋把歷史事實分作三個層次：「在眾多史實中，有些史實證明只不過是一些事實，這類占了大多數。有些史實可以推出部分的結論，而哲學家能藉以判斷一個行動的動機，或一個人的某些特殊徵象：這些只是一串鎖鏈中的某個連結。」但是，只有少數事實，「其影響擴及整個體系，而其互相關聯密切，因而能給予行動之動力」。史家要有不凡的識見，才能辨識出足以影響全局的事實。「一個這樣的天賦者：知道如何在一堆混雜的事件中，將這類事實，純粹、全無混雜地，從其餘者，區辨或抽譯出來」。[178]吉朋承認，這樣的史家天才並非世出，實在難得一見。

每件史實都有其自身的價值，但價值的高低與史實的大小並無必然的關連。有些事實表面上看起來耀眼，卻未必具重要證據價值或解釋潛力：「一個顯眼的行動有時候或許像閃電般炫人眼目，可是我們能從其中收集到的光芒實在很少。」這類事實價值，除非將其與同類行動進行比較，從事實歸納出結論，才能適當判定其價值。[179]相對地，有些事實看起來或許瑣碎、平凡，卻可能蘊含重要歷史價值。事實上，輕微小節時常比最矚目的行動更值得注意，[180]「孟德斯鳩即可能從最瑣碎的事實之中，發現到平凡人看不到的關聯性」。[181]

哲學的歷史家還要有「觀察入微」功夫與「見微知著」的洞察力。吉朋呼籲歷史家在考察歷史時不能忽略小節，細瑣小節經常能透露有價值的信息。人們通常不會對一些枝微末節的舉止預作掩飾，而確實「人

177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89-91.

178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99-100.

179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01.

180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00.

181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們只有在想像不會被窺見時才會寬衣解帶」。[182]就是因為自然流露、不作掩飾，流露出的信息才具真實性。一個社會的性格有時會在平常的細微末節中表露無遺：「從羅馬人在圓形競技場上斥責即將被分屍的可憐罪犯，我發現到羅馬人的兇暴，和他們在卡丕拓前勒死一個俘虜的國王顯露的是一樣的。」[183]羅馬觀眾在競技場上對臨刑的罪犯大聲叫囂，是一種集體心態的自然表露。

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或一個宗教群體，往往會引導自己的群體以相同方式看待相同事物。久而久之，這會在自己群體內部形成一種「普遍相類的心態」。這種心態構成一個社群的共同心理機制，而「即便最能免除偏見的心靈，都難以完全將其卸除」。眼光敏銳的史家，即可從社群的普遍心態，去掌握此一社群獨特的行為模式：「我是在希臘人中，找尋民主的煽動者；在羅馬人中，找尋狂熱愛國者；在康莫德斯（Commodus）、賽維魯斯（Severus）、卡拉喀拉（Caracalla）的臣民中，找尋專制權力的辯護者。」[184]

最後，哲學的歷史家還要能從歷史的脈絡去考察史實，以確證歷史重建能夠趨近真實。史家重建古代歷史須依賴古代文本，但他要如何掌握古代文本內涵與意義？吉朋主張文本必須放在其產生的脈絡，才能解讀真正涵義：

> 吾人處在不同地方，生在不同時代，若不能把自己放在與希臘人與羅馬人的相同視界，必然看不到那種種的美。唯有對他們的情境與習尚掌握詳盡的知識，才能使吾人做到這點。從一些評註蒐羅到的皮毛概念與貧乏的訊息，僅能協助吾人抓到比較淺顯、表面的美：其作品中所有的雅緻、所有的優美，吾人將都錯過。[185]

史家如果對古代熟悉，會在內在形成一種「心理傾向」（turn of mind），

182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02.

183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02.

184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91-92.

185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讓他能設身處地以古人的眼光來認識古代：「對古代的熟悉，是對古人著作唯一的真註釋；然而，更必要的是因對古代熟悉而生的一種心理態度；此一心態不但有助於認知事物，且可使這些事物與吾人的觀念相熟，而激使吾人以古人的眼光來觀看古人。」[186]這一概念就是現代史學所說的「移情作用」。

吉朋以羅馬詩人味吉爾（Virgil，拉丁名 Publius Vergilius Maro, 70-19 BC）《農事詩》（*Georgics*）的寫作為例，說明史家必須熟悉古代歷史，培養一種設身處地的態度，才能以古人的眼光看待古典，從而掌握古典的真意。

味吉爾是奧古斯都時代的詩人，創作了著名田園風味的《農事詩》，極力歌詠義大利鄉野生活之美。然而，味吉爾時代的義大利農村景象，真如其詩歌描寫的那麼美好嗎？經過長期內戰，羅馬農村實際上受到嚴重破壞，鄉民生活絕非如他描寫的美好。問題是，味吉爾何以會寫一首不符實情的詩篇？吉朋在研究其創作脈絡後，主張味吉爾並不是在寫一篇平常的抒情詩，而是胸懷「一個同樣尊貴、崇高的意圖」。[187]味吉爾的意圖為何？吉朋認為必須把《農事詩》放到奧古斯都時期歷史脈絡考察，才能掌握。這個脈絡是什麼？

共和後期以來，羅馬因長期內戰致使軍隊數量大幅膨脹。奧古斯都在內戰結束後面臨軍隊復原問題。一方面，軍隊太多對政府造成財政壓力，另一方面，軍人的暴戾也常造成社會不安。奧古斯都遂決定裁軍，讓多數軍隊回歸田園。但羅馬軍人長期習於行伍生活，怎會甘於回頭作平凡的農夫？

在這時候，吉朋推測，奧古斯都想到利用友人味吉爾的才華，協助以「和諧的詩篇，使這群不遜的軍人甘心安於他們的新環境」。味吉爾寫《農事詩》，目的不是要教導士兵如何耕農，而要以「感人的詩句描述鄉間生活的寧靜、純真與快樂」。吉朋認為奧古斯都的作法是「經過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186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25-26.

187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35.

算計」，意圖藉文學宣傳來說服羅馬軍人脫離戰爭的誘惑，樂於解甲歸田。[188]換言之，味吉爾欲透過文學達到政治目的：以抒情詩去除軍人的兇狠性格，將其結合在和諧的社會紐帶之中。[189]

總之，歷史家惟有熟悉古人的歷史，培養設身處地的態度，才能以古人眼光看古典，理解其真義：「我們若對羅馬人的歷史、政治與宗教，古義大利的地理，奧古斯都的性格，及他跟元老院與人民間的特殊關係等，缺乏完整的知識，就不可能了解味吉爾作品的旨意、技巧及其實際的美感。」[190]唯有如此，歷史家才可能掌握古代歷史的真實面貌。

四、吉朋與他的典範史家

吉朋博覽群籍，認識無數古今史家。在古今歷史家中，吉朋都有他尊敬或推崇的對象。然而，誰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典範？

（一）誰是理想的史家？

近代早期史家之中，吉朋推崇過兩類作者：一類是治學勤勉、學問精確的古典學者，另一類是風格文雅、具哲學思維的歷史家。在古典學者中，17 世紀的法國學者提勒蒙與 17、18 世紀間義大利學者穆拉多利深受其敬重。

提勒蒙是位勤奮治學的博學派（Erudition）古典學者，長期耕耘羅馬史與教會史。這位博學派學者治學的精確令吉朋傾倒不已：他那「難以模仿的精確，幾乎達到天才的境界」。[191]提勒蒙是典型的 17 世紀古物學者，孜孜於蒐集、考訂史實，「以難以置信的耐心和宗教的精確，纂

188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41-42.

189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44.

190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30-31.

191 Gibbon, *Autobiography*, p. 1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集了聖徒傳記」。[192]吉朋說他「將教父們遺下的細碎殘渣全都扒攏在一塊」，形容他是「一個有用的廢物清理夫」。[193]提勒蒙的羅馬史知識廣博，考訂精確，編纂的《羅馬皇帝史》，在吉朋眼中，比其引用的古代原著還精確。[194]吉朋敘述古代後期、中世紀早期時常引證提勒蒙的著作，不時發出讚嘆之聲：「提勒蒙的勤勉，……蒐集了每一樁事實，檢視過每一項難題。」[195]

穆拉多利是中世紀史專家，吉朋曾在《衰亡史》中特別介紹其學術與成就。[196]穆拉多利是摩得那（Moderna）公國教士，在米蘭（Milan）和摩得那圖書館研究義大利中世紀史長達 60 年。[197]吉朋對其評價極高：「在他所有著作中，穆拉多利證明自己是一個用功、勤奮的作者，超越了一個天主教教士的偏見。」[198]他讚揚穆拉多利敘事本於「實學，且不帶偏見」、[199]考訂「正確而富批判精神」。[200]《衰亡史》撰寫到中世紀議題時常引用穆拉多利：「在所有編年史的指引中，穆拉多利是最安全的。」[201]穆拉多利治學也屬於博學派傳統，致力於多種義大利中世紀重要史料的編纂；[202]吉朋晚年也意識到編纂、保存英國古代史料的重要性，

192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p. 374, n. 41.

193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p. 153, n. 52.

194 Low, *Gibbon's Journal*, p. 163.

195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362, n. 97.

196 吉朋在《衰亡史》最後第 2 章最後一個註釋中，詳細介紹穆拉多利的史學，見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7, pp. 299-300, n. 110.

197 有關穆拉多利的史學，參見 Hay, *Annalists and Historians*, pp. 165-167, 176-178.

198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7, p. 300, n. 96.

199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7, p. 236, n. 75.

200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5, p. 12, n. 15.

201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5, p. 14, n. 27.

202 吉朋整理穆拉多利著作如下：1.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25 vols. (Milan, 1723-1751); 2. *Antiquitates Italiae medii Aevi*, 6 vols. (Milan, 1738-1743); 3. *Dissertazioni sopra le Antiquita Italiane*, 3 vols. (Milan, 1751); 4. *Annali d'Italia,* 18 vols. (Milan, 1753-1756); 5. *Dell Antichita Estense ed Italiane*, 2 vols. (Moderna, 1717, 17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曾感嘆：「我們不知要到何處尋找我們英格蘭的穆拉多利！」[203]

這些學者或史家可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史家」嗎？顯然不是。吉朋推崇的是其治學的嚴謹與學的問淹博、精確。不過，他們是史實的考訂家與史料的編纂家，至多是吉朋在治史上的「嚮導」或「師父」，並不符合他所謂的哲學的歷史家，自然不可能是他的理想史家。

在近代歷史家之中，蘇格蘭史家休姆與羅伯森的傑出表現曾讓吉朋折服不已：「過去人們非難：不列顛不曾樹立祭壇來崇拜歷史女神。近年，這個舊說已為羅伯森和休姆的一流表現所否定。」他推崇這兩位北方不列顛史家：「羅伯森博士完美的寫作、有力的語言，優雅的文章，激發我的雄心，希望有一天能夠繼踵其腳步；而他的朋友兼對手（按：指休姆）的冷靜的哲學、自然而難以模仿的美，常令人掩卷嘆息，心中夾雜著喜悅與絕望。」[204]

休姆的《英格蘭史》與羅伯森的《蘇格蘭史》在寫作上都富有新意。休姆在歷史詮釋上表露的「冷靜的哲學」，[205]羅伯森在文章風格上「無法模仿的美」，都超越枯燥的編年或瑣碎的考證，而為哲學的歷史的佳構。這兩位蘇格蘭史家傳承了以近代語言書寫歷史的傳統，吉朋對自己能與之同列「不列顛史家三雄」，深覺與有榮焉。儘管如此，吉朋並沒有拿休姆與羅伯森作為典範。他們的書寫對象都是近代歷史，無法作為吉朋書寫羅馬史的參照。

在近代學者中，吉朋最尊崇的是他的思想啟蒙導師孟德斯鳩。1750年代初吉朋到洛桑時，《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 1748）方出版數年。他讀後深受震撼：孟德斯鳩「以有力的文體與大膽的假設，強

203 Gibbon, "An Address, &c.,"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vol. 3, p. 571.

204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5.

205 吉朋並非一味讚揚休姆，對其論點偶有批評之處。例如，他讀《英格蘭史》卷 1 論及政教關係時，評論說：「休姆先生結論下得太快：如果俗世與宗教權力掌握在同一個人之手，無論此人稱作君主或教士都無關緊要，因為其俗世性格總是要占優勢。」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 Empire*, vol. 7, p. 298, n. 1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力喚醒、啟發了這個時代的心靈」。[206]他撰寫《論文學研究》時還刻意模擬孟德斯鳩風格，雖然後來坦承這一早期著作不成熟，論述曖昧、不連貫，沒有章法或聯繫，只是堆積「一堆歷史的、批判的、哲學的意見與實例」。無論如何，這本處女作中「某種哲學精神的曙光，啟迪了我對歷史與人文研究作的概括考察」。[207] 30 多年後，吉朋對之依然懷抱敬意：「自出版以來四十年，沒有一本書比它受到更多閱讀、遇到更多批評；其激發的探究精神是吾輩最應感謝這位作者之處。」[208]

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探討的課題，與吉朋的《衰亡史》相近。在這本書中，孟德斯鳩對羅馬盛衰的原因提出一些「哲學的」反思，吉朋對其富於想像力的歷史詮釋深為折服，不時在《衰亡史》中引用。第 7 章敘述西元 243 年禁衛軍將領菲律普（Philip）的崛起，吉朋討論到羅馬帝國軍人政權的本質，即「忍不住抄錄」孟德斯鳩的一段討論：

> 在這個世紀，人們稱為羅馬帝國的東西不過是一種不正規的共和國罷了。這種共和國的確有點像阿爾及爾的貴族政體，因為在那裡擁有統治大權的軍隊決定人們稱為戴伊（Dey）的長官的立廢。這可能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原則，即軍事統治在某些方面與其說是君主制的，毋寧說是共和制的。人們不要認為士兵只是用不服從和嘩變來參與管理；皇帝們對士兵所做的演說在性質上，歸根到底豈不是同當日執政官和保民官對人民所做的演說一樣嗎？儘管軍隊沒有一個專門集會的地點，儘管他們不是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儘管他們並非總是冷靜的，而是考慮的少行動的多，但他們豈不是全權掌握了國家的命運嗎？一個皇帝如果不是一個殘暴的、為士兵的特殊利益而選出來的政府的大臣，他又是什麼呢？[2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6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5.

207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100-101.

208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6, p. 319. n. 147.

209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192. 出自孟德斯鳩著，婉玲譯，《羅馬盛衰原因論》，頁 92。

這段文字出自《羅馬盛衰原因論》第 16 章。吉朋認為孟德斯鳩的描述是「明智的，雖有些天馬行空」。見解創新而實證不足，吉朋經常對孟德斯鳩作如是的評論。這應是吉朋無法把他當作史家典範的原因。

（二）塔西陀與吉朋的典範

《衰亡史》第 1 卷問世之後，巴黎社交界名媛內克夫人（Madame Necker）是最早的讀者。內克夫人讀後向吉朋說明心得：「我觀察到，他（塔西陀）是您寫作的典範，甚至是源頭。這個源頭隨著許多世代思想洪流的匯入而擴大。您展示出，豐富與敏銳的想像力能增加怎樣的智識深度與廣度。」[210]內克夫人本名蘇珊・柯卓（Suzanne Curchod, 1737-1794），是吉朋在洛桑讀書時的初戀情人。[211]她日後下嫁日內瓦銀行家賈克・內克（Jacques Necker, 1732-1804），在內克出任法國財政總監後，活躍於巴黎上流社交界。內克夫人不愧是吉朋的知音，其評論敲中他的心絃。現代史家大都認同她的評斷，美國史家喬丹（David P. Jordan）即指出「塔西陀的精神與典範，充滿在全部的《衰亡史》中」。[212]塔西陀確實一直是吉朋心目中理想史家的典範。

吉朋很早就接觸塔西陀的著作。1750 年代初期，少年吉朋初讀戈登譯的塔西陀《著作集》的「豪華對開本」。[213]到洛桑後，他進而研讀拉丁本塔西陀著作。他在《日誌》1756 年條記錄他在這年系統地閱讀拉丁作家，歷史部分包括：沙魯斯特、李維、維列烏斯（Velleius Paterculus c. 19 BC-AD 30）、瓦勒瑞烏斯、塔西陀、蘇東尼烏斯、科西烏斯、查士

210 轉引自 G. M. Young, *Gibbon*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32 / 1948), p. 138.

211 有關吉朋與蘇珊・柯卓的交往，參見 D. M. Low, *Edward Gibbon 1737-1794*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7), pp. 73-91.

212 David P. Jordan,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p. 173.

213 Gibbon, *Autobiography*, p. 31. 吉朋的藏書中保存有這個譯本，見 Geoffrey Keynes, ed., *The Library of Edward Gibbon*, 2nd ed. (Dorset: St Paul's Bibliographies, 1980), p. 2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丁（Justin, 西元 2 或 3 世紀）、弗羅魯斯。[214]當中包含了塔西陀的著作。

從這之後，吉朋對塔西陀的研究狀況，因資料欠缺並不清楚。可確定的是他 1758 年動筆《論文學研究》時，對塔西陀已至為推崇：「塔西陀是我所知的作家中，唯一符合我觀念中這樣的一位哲學歷史家，甚至有趣的李維在此意義上也無法與其相比。」[215] 1761 年，當吉朋思考投入史學工作時，即以塔西陀自勵：「我是否適於追求一個塔西陀自認為適合、而普林尼（Pliny）卻懷疑自己適合的文學生涯？歷史家的職務是體面的，正如純粹年鑑家或官報編纂者是可鄙的。至於我適合那一項工作，在我試過能耐之前，是不可能知道的。」[216]吉朋顯然已經把塔西陀當作自己的史學典範了。

自文藝復興以來，李維一直是最受推崇的古代史家，其《羅馬史》長期是人文主義史家的典範。李維以演說家的角色書寫羅馬史，文字雄辯，富表現力，動人心弦，受到 16 世紀讀者的歡迎；他更以道德家立場詮述共和主義與愛國精神，也切合危機時代義大利人的需要。[217]但 17 世紀以來，歐洲專制政治盛行，共和主義受到排拒，李維聲望受到影響，光芒不再。在政治專制時代，世人需要「審慎」的智慧作引導，而塔西陀政治上務實，其史著在撻伐暴政之餘留下許多「政治審慎」箴言，可供人們處世之引導，逐漸受到青睞。[218]在史學方面，書寫風格也起了變化，人們不復強調文字的「雄辯」，轉而重視歷史的「真實」。李維的史作長於修辭，史實方面被認為有不足之處。相對地，塔西陀擅長探索史實背後的因果與隱藏的動機、挖掘人物的心理動機，似乎更符合 17 世紀歷史書寫的要求。[219]

---

214 Low, *Gibbon's Journal*, p. 5.

215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07.

216 Gibbon, "Hints for Some Subjects for History,"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vol. 5, p. 487

217 Burke, "A Survey of the Popularity of Ancient Historians," pp. 146-148.

218 Burke, "A Survey of the Popularity of Ancient Historians," pp. 137, 149-150.

219 Burke, "A Survey of the Popularity of Ancient Historians," pp. 150-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吉朋推崇塔西陀，將其地位提到李維之上，反映的正是 17 世紀以來歐洲史學的變化。吉朋何以推崇塔西陀？塔西陀作為史家展現的風骨是重要原因。《衰亡史》16 章引用塔西陀對早期基督教的記載，敘述尼祿皇帝迫害基督徒的情節，在行文中追溯了塔西陀的生平與學術。吉朋推斷塔西陀可能誕生在羅馬大火發生前幾年，但他「靜靜地等到才幹完全臻於成熟，才公開在社會亮相」：直到 40 幾歲始著手撰寫第一部史著，以紀念岳父阿格里古拉（Agricola）的德操。這時，納爾瓦（Marcus Nerva, 96-98 在位）已經執政，先前的恐怖政治結束，塔西陀才提筆寫歷史。吉朋接著說，在《阿格里古拉傳》與《日耳曼志》兩書初試文才後，塔西陀「才構思、並最後執行一個更艱巨的著作：從尼祿倒台到納爾瓦即位期間的羅馬史」，此即《歷史》一書。[220]

納爾瓦的統治為羅馬帝國帶進一個「正義與繁榮的時代」。當塔西陀繼續其撰史工作時，吉朋指出，他並未選擇替此一美好時代錦上添花，反而回頭對奧古斯都以後 4 位繼承者的暴虐統治進行控訴：

> 在近觀他的主題後，他判斷與其去讚揚一個在任皇帝的德行，不如記錄昔日暴君的罪行，是更高貴或說較不招忌的工作。在皇帝圖拉真（Trajan, 98-117 在位）晚期，當這位勝利的皇帝將羅馬的勢力伸展到其古代疆界之外時，這位歷史家卻在《編年史》第二與第四書裡，敘述提比流斯（Tiberius, 14-37 在位）的暴政。[221]

對吉朋來說，這就是塔西陀在史家器識與職守上過人之處：「歷史致力記錄過去的事務，作為未來的指導。假如歷史屈身為暴君說話，或替迫害的信條合理化，那就有虧它的高貴職守。」[222]塔西陀在生命的最重要階段，投入一樁可讓他充分發揮才情的工作。在《編年史》中，吉朋讚嘆說，塔西陀致力收集資料、處理問題，將 40 年的史事寫成一部不朽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20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87.

221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87.

222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81.

作，書中「每一句都充滿著最深刻的觀察與最生動的描述」。[223]

其次，吉朋讚賞塔西陀的治史方式與史學風格。從他對李維與塔西陀的比較，可以理解吉朋何以喜歡塔西陀。李維與塔西陀都是傑出的古代史家，「遠遠超越那些無知的編纂家」，這毫無疑問。然而，吉朋指出，兩者史學風格相異，「李維猶如一個修辭家在寫歷史，塔西陀則像是一個哲學家」：

> 這並不是因為塔西陀不懂得感性的語言，或李維不會用理性的語言；但李維熱衷於娛悅讀者，甚過於教導，一步步引導人們伴隨他的主角，讓人們交替體會到恐怖、憐憫與景仰的效果。塔西陀運用修辭力量，則只是為了把歷史事件之間的環節關係說清楚，或用明智和深刻的反思來啟發讀者。[224]

李維擅長修辭，撰史常慷慨陳詞，大聲撻伐權力的濫用與暴君虐政：「李維向我描述：權力的濫用，嚴厲得連自然都不寒而慄；構成自由精神的憎恨與愛國情操；與在它們聯合攻擊下倒台的暴政。」[225]然而，在吉朋看來，李維的歷史往往只敘述表象的政治，對羅馬的法律、其與社會的連繫、與共和成敗的關係等，完全沒有觸及：

> 十人行政官制定的法律，它的特色與缺陷，它與羅馬人民的性格、他們自己的團體、他們的雄心企圖之間的契合度，李維完全忘卻。我沒看到他在著作中解釋：為何那部為貧窮、半開化的小共和國制定的法律，當制度的力量將之推到最高點後，竟然顛覆了共和。[226]

這些方面的探討，吉朋指出，「應該可在塔西陀的書中找到」。[227]塔西陀《編年史》第 3 書 26 到 28 節，探討羅馬法律的起源與演變，對羅馬法律的制定與濫用，有深刻的省思。「國家過去雖由于惡習而遭受災難，

223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87.

224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107-108.

225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08.

226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108-109

227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目前卻由於法律而大遭其殃」，他寫道，「國家弊端登峰造極之日，正是法律多如牛毛之時」。[228]

此外，塔西陀的文字風格更令吉朋心儀不已。吉朋曾在《日誌》稱許塔西陀言簡意賅：「塔西陀的文筆簡潔（conciseness），……避免任何無關宏旨的敘述，能以一精確、有力的文句抓住主要概念。」[229]《衰亡史》討論塔西陀對尼祿迫害基督徒的敘述時說：「塔西陀文筆極其簡潔，認為可按下一些直接的細節和觀念不表，而信賴讀者的好奇心或反思力，自己去提供、補充。」[230]關於《日耳曼志》，吉朋也讚揚說：「他的描述簡潔精到，適值以勞動無數考古家的辛勤努力，也激勵我們這個時代哲學的歷史家的才華和洞識。」[231]塔西陀文字的「簡潔」與「精確」，是吉朋致力模仿的對象。

1763 年，吉朋讀 2 世紀羅馬詩人朱文諾（Decimus Junius Juvenalis）《諷刺詩》（*Satires*）第 15 首，發現朱文諾以短短 5 行韻文，就把古羅馬人的特質，如純樸勤勞、家庭和樂，妻子多產、節制飲食、不喜外國奴隸的服侍等，完整呈現。吉朋讚賞他用字「精準」與「簡潔」：「朱文諾表現的是塔西陀與孟德斯鳩式的簡潔，在刪節多餘與不必要的字詞後，以精確、嚴密的措辭表達主要思想。」[232]不過，吉朋並不贊同作者為簡約而簡約，寫作時刻意節省文字，為求形式的簡潔而犧牲表達的完整。他同樣藉朱文諾的文字功夫，諷刺當代某些作者的形式主義：「朱文諾的簡潔與當今作者普遍所持者不同，當今作者時常要強化某一觀念，實際上反而勒死了那個觀念；他們用幾個荒謬的字眼，展示給我們的不過是一個觀念的四分之一，卻對自己的書寫技巧大加吹噓。」[233]

如果朱文諾文字有「塔西陀的簡潔」，羅馬史家笛歐則敘事繁冗。

228 塔西佗著，王以鑄、崔妙因譯，《編年史》，上冊，頁 154-156。

229 Gibbon, *Journal B*, p. 33. 轉引自 Jordan,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 180.

230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87.

231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189.

232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pp. 306-307.

233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p. 3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衰亡史》第 3 章，吉朋描述奧古斯都操弄元老院達成獨裁願望後，向元老發表一篇「矯情的演說」，替自己過去的作為辯護。笛歐在《羅馬史》（*The Roman History*）中載有全文，長達數頁。吉朋嫌其文字「冗長而誇大」，決定「從蘇東尼烏斯和塔西陀，借用奧古斯都大略的語言」，改寫如下：[234]

> 他對過去的作為感到遺憾，但寬恕自己。孝心要求他親手替父親的遭謀害復仇；他仁慈的本性有時會屈從嚴峻的必要法則，並勉強與兩位卑鄙的同僚聯手：只要安東尼（Marcus Antonius, c. 82-30 BC）還活著，共和即不容許他把共和放棄給一個墮落的羅馬人與一個野蠻的女王。現在，他終於可放手踐履他的責任和願望。他慎重地歸還元老院和人民全部他們的古代權利；並只切盼重返到他的公民同袍群眾之中，同享他替國家爭得的種種福祉。[235]

吉朋的文字保有塔西陀的「簡約」精神，言簡意賅地抓住奧古斯都的心思，語氣中帶有一種吉朋特有的文雅諷刺意味。

吉朋更喜歡以塔西陀的文筆來論斷其他史家的不足。他對待羅馬史家笛歐的態度是最佳實例。奧古斯都在元老院發表演說，表明還政元老院與人民，並回歸普通公民身分。這個表白，吉朋嘲諷，「展現奧古斯都的愛國心，卻掩飾了他的野心」。元老院與奧古斯都交過手，自然不會信以為真，聽完表白後不知如何反應，因「若相信奧古斯都是句句真心，是件危險的事；可是若露出絲毫不信任，卻又更危險」。一時間元老院各種情緒紛陳，「那些刻意壓抑在心裡的，和那些真正受到感動的」，實在難以筆墨形容。吉朋感嘆：「這需要塔西陀的如椽之筆，才有辦法

234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61, n. 6.

235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61. 這段文字部分明顯採自塔西陀《編年史》第 3 書第 9 章。塔西陀敘述奧古斯都逝世時，社會對其過去作為的爭論：「有見識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去頌揚他或責難他。有些人認為，『對繼父的孝心和當時法紀廢弛的國家緊急狀況，驅使他發動了內戰，而人們在發動或進行內戰時是不能考慮手段問題的。為了追究謀殺他繼父的兇手，他向安托尼烏斯、向列庇都斯作了許多讓步。』」塔西佗著，王以鑄、崔妙因譯，《編年史》，上冊，頁 10。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刻劃出元老院的種種情緒反應。」[236]吉朋在此刻意頌揚塔西陀，而貶抑笛歐的文采。事實上，比對笛歐《羅馬史》可以發現，笛歐對元老們聆聽演說後的不同反應，有相當冷靜、仔細、完整的描述。但吉朋無視這些敘述，卻嫌其欠缺塔西陀的史筆，無法生動刻劃出元老院的情緒。

阿米亞努斯是另一實例。阿米亞努斯的《羅馬史》（*Rerum gestarum*）從西元 96 年寫到 378 年，刻意接繼結束於西元 96 年的塔西陀《歷史》一書。阿米亞努斯既然刻意摹仿塔西陀，吉朋忍不住比較兩人的史學：「在敘述有名的羅馬人無辜喪命、犧牲在幾位早期凱撒殘酷刀下時，塔西陀的筆下功夫與受難者的功績，會在吾人胸中激起最強烈的恐怖、景仰與憐憫之情。阿米亞努斯則是用粗糙、毫無特色之筆，以冗長、令人厭惡的精確描繪了他的血淋淋人物。」[237]兩者的史學功夫高下立判。

（三）從《歷史》、《編年史》到《衰亡史》

《衰亡史》在第 1 到 3 章中敘述西元 96 年到 180 年，即納爾瓦當政到奧里略（Marcus Aurelius, 161-180 在位）逝世期間羅馬帝國的盛況，再從第 4 章起敘述帝國從極盛逐漸衰亡的歷程。吉朋何以選擇羅馬帝國聲勢的頂點作為帝國衰亡敘述的起點？這是個有趣的課題。吉朋討論到羅馬帝國衰亡原因時曾點出：「羅馬的敵人在其內部：暴君與軍人。」[238]暴君與軍人並非西元 180 年後新生的現象，在奧古斯都逝世不久已現端倪。在塔西陀筆下，提比流斯與尼祿的統治都曾帶給帝國恐怖與混亂。假使「暴君與軍人」是羅馬帝國衰亡的根本原因，吉朋何以不從尼祿或提比流斯時期說起？

關於這點，可從吉朋晚年的反思中推敲一二。1791 年，吉朋曾想整理用過的史料，出版成冊，作為《衰亡史》的附錄。他重讀《衰亡史》，

236 迪歐的描述，詳見 Dio Cassius, *The Roman Histo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7), book liii, p. 219.

237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p. 19.

238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1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頁邊留下一些邊註，其中一條反思他過去的選擇：

> 我不該為那個夾在兩個鐵的時代中間的幸運時期撰寫歷史嗎？我不該從尼祿倒台引起的內戰，甚或從奧古斯都繼承者的暴政，去推源帝國的衰亡嗎？啊！我確實該作：然而，這遲來的領悟又能如何？錯誤既已無法挽回，悔恨只是徒勞。[239]

《衰亡史》是從 96 年到 180 年羅馬帝國這一段「幸運時期」寫起。吉朋此時反躬自省：這個選擇不對嗎？在法國大革命引起的不確定氛圍中，他的內心似乎起了疑惑。在此一時刻，吉朋自問當年何以沒有從「尼祿倒台引起的內戰，甚或從奧古斯都繼承者的暴政，去推源帝國的衰亡」？他承認，從奧古斯都逝世時起探源羅馬帝國的衰亡，確實是比較順理成章。[240]只是錯誤已成事實，後悔只是徒然。

然而，對吉朋來說，選擇從西元 96 年起始的「幸運時期」來敘述羅馬帝國的衰亡史，是一種偶然嗎？這個問題若放在吉朋與塔西陀關係的脈絡下，也許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塔西陀寫過兩部歷史，敘述奧古斯都逝世以後 80 年帝國史事。《歷史》一書先寫，從西元 69 年尼祿逝世寫到西元 96 年多米提安被刺；《編年史》後寫，敘述西元 14 年奧古斯都逝世到西元 68 年尼祿被殺之間的史事。吉朋撰寫《衰亡史》的起始點，正好是塔西陀絕筆之處，看起來並非完全是一個偶然。

吉朋極可能是刻意錯開塔西陀書寫的時代。他對塔西陀懷抱敬意，覺得塔西陀已將羅馬帝政初期的歷史交代得很完美，自己毋庸重新寫過。吉朋自然知道塔西陀的著作傳世者並不完整：《歷史》原本 14 書，只存留第 1 書至第 5 書開頭部分，到西元 70 年 8 月；《編年史》原本 16 書，存留有 1 至 6 書與 11 至 16 書。即便如此，吉朋仍未選擇重新處

239 Craddock, ed., *The English Essays of Edward Gibbon*, p. 338.

240 G.W. Bowersock, "Gibbon on Civil War and Rebellion in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105, no. 3 (Summer 1976, Cambridge), p. 69; Paul Cartledge, "The 'Tacitism' of Edward Gibbon (two hundred years on),"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4, no. 2 (1989, Israel), pp. 254-2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塔西陀作過的歷史。吉朋視塔西陀為史學的巨人，他的風格有種「無法模仿的氣質」。[241]吉朋 1770 年代動筆寫《衰亡史》時尚是一介史學新兵，不願貿然踏入塔西陀的領域，深怕達不到塔西陀的完美境界。他作如此選擇，或許可以看作是對塔西陀致敬的一種方式。

吉朋撰寫《衰亡史》雖刻意避開塔西陀的時代，但在寫作過程中，塔西陀仍是他喜歡徵引的作者。根據現代學者的整理，《衰亡史》引證塔西陀達 208 次之多，遍及《歷史》、《編年史》、《阿格里古拉傳》與《日耳曼志》諸書。[242]他在《衰亡史》第 9 章敘述日耳曼民族的起源、歷史與文化時，大致上就是根據《日耳曼志》的資料。這一章有 59 個註腳，其中 36 次引證塔西陀，而在這之中，《日耳曼志》又包辦了 34 次。

吉朋不僅是把塔西陀著作當作重要史料，他甚至喜歡直接摘引塔西陀原文來豐富自己的敘述。以《衰亡史》第 9 章為例，吉朋考察日耳曼社會「愛好自由」，認為與他們不重視財產的習俗有關：「日耳曼人是好戰的民族，沒有城市、文字、藝術與金錢，這種野蠻狀態可以在享受自由中得到一些補償。」貧窮保障日耳曼人的自由，因「人的慾望與財物是專制最厲害的枷鎖」。[243]在此，他引用《日耳曼志》44-45 章提到的一個特例，證明財產的擁有會損害自由的享有：

> 綏約內斯人（Suiones）（塔西陀說）尊重財富。正因如此，他們受到一位專制君主統治，這位君主不放心人人可以自由使用兵器，像日耳曼其他部落那樣，他不把兵器交由一個公民、甚至獲得自由者，而是委由奴隸來保管。……綏約內斯人的鄰族席托內斯人甚至淪入奴役狀態：他們服從一個女人。[244]

241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86.

242 詳見 David Womersley 作的統計，見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ces by David Womersley (London: Allen Lane, 1994), vol. 3, p. 1266, “Tacitus”.

243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223.

244 Tacitus, *Agricola and Germania*, trans. Harold Mattingly (London: Penguin Group, 1948/2009), pp. 55-56, Chaps 44-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吉朋接著說，塔西陀提到綏約內斯人的實例，「充分認可了一般的政治理論」。[245]另一個實例是錄引《日耳曼志》33 章，來說明羅馬帝國對日耳曼的策略：

> 卜茹克特瑞人（Brucreri）（現由塔西陀繼續說）全遭鄰近部族殲滅，這或許是由於他們的專橫深受憎恨，或許是由於他們的財產受到覬覦，或許是因羅馬諸神降予的啟示。大約 6 萬多人死於這場戰鬥，雖非倒在羅馬刀劍之下，卻是在我們的眼下，供我們娛樂。但願這些羅馬的敵對部族永遠互相仇視！我們目前已臻帝國繁榮的頂峰，能夠祈求的幸運，除了蠻族的內鬨外，再無其他！[246]

塔西陀祈願日耳曼部族經常內鬥，以便羅馬人坐收漁利。吉朋對這種幸災樂禍心理並不以為然，批評塔西陀在此「愛國精神」超越了「人性」。但毋須諱言，吉朋點出，塔西陀確實表達了羅馬「固定的政策理念」，認為與其討伐蠻族，還不如讓其裂解，是比較安全的權宜策略。[247]

吉朋引用塔西陀最典型的例子，要數日耳曼軍事「扈從制度」一段。《衰亡史》第 9 章追溯、分析日耳曼的軍事扈從制時，吉朋大篇引錄《日耳曼志》的敘述：

> 最尊貴的少年，若不能側身為一位富聲望酋長的侍從，為他戰鬥與服務，則深以為恥。侍從之間普遍出現高尚的競爭，獲取酋長的賞識，爭得鰲頭；酋長之間也有競爭，以爭取最多數量的勇敢侍從。常有一群精選的青年人環繞身邊，既是一種驕傲，也是一種力量；在安寧無事之時可展示威儀，在臨陣交鋒之際，可保衛左右。這類傑出英雄的聲威遠播四鄰，外族派來使節，致贈禮物，以博取他們的友誼。而僅憑他的威名，就足以懾服敵人，確定他支持的一方獲得勝利。在危急時刻，酋長若勇敢不如侍從，是他的恥辱；侍從若勇敢不如酋長，也是他們的恥辱。假使酋長戰死，而自己卻生還，

245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223.

246 Tacitus, *Agricola and Germania*, p. 50, Chap 33.

247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p. 233-2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則是畢生的羞辱。保衛酋長和以自己的戰利品添增酋長的榮耀，是他們最神聖的任務。酋長們為勝利而戰鬥，侍從們則為酋長而戰鬥。假若本土長年安寧無事，最尊貴的戰士們會將其眾多徒眾，遠送到那些正發生戰鬥的部落，以勞動他們好動的精神，並且藉自動赴難以博取名聲。從慷慨的酋長手上，侍從可以獲得戰馬和沾有血跡的鋒利長矛，作為戰士的獎賞。粗陋但豐盛的宴飲，是他唯一能給予，或他們唯一能接受的報酬。這些豐厚的物資是從戰爭、劫掠和朋友的奉獻而來。[248]

這段引文出自《日耳曼志》第 11 章，塔西陀文筆簡練、行文流暢、敘事清晰，在吉朋眼中已完美描述古日耳曼的軍事文化，再無剪裁必要。塔西陀的原文是拉丁文，吉朋親手將其翻譯成英文，譯筆也帶有塔西陀式的簡練與流暢，但多了一種吉朋特有的典雅與含蓄。

這樣的引用方式也可視為吉朋向塔西陀致敬的另一種方式。關於這點，還可以另一例來說明。《衰亡史》第 30 章敘述 472 年羅馬帝國軍人瑞西莫（Flavia Ricimer, 456-472）——一個羅馬化西哥德人——攻陷羅馬的史事。吉朋找不到羅馬陷落的直接紀錄，但發現塔西陀《歷史》中敘述 69 年帝國內戰時維斯帕西亞努斯（Vespasianus, 69-79 在位）擊敗維提里烏斯（Vitellius, 15-69），攻陷羅馬的景象差可比擬，遂模擬塔西陀的文字，這樣敘述瑞西莫攻陷羅馬城的情景：

> 士兵們結合公民的黨派憤怒與蠻族的野蠻習俗，大肆縱情搶奪與殺戮，一無節制；奴隸與平民等群眾，則以事不關己，只藉不分青紅皂白的搶掠，得到好處；整座城市的容貌，呈現出一種奇特的對照：一方面是嚴酷的殘忍，另一方面是恣意的放縱。[249]

比較塔西陀《歷史》第三書第 82 章，吉朋模擬的痕跡相當明顯。[250]在此，

248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226. 塔西陀原文見 Tacitus, *Agricola and Germania*, p. 50.

249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4, p. 45.

250 塔西陀《歷史》第 3 書 82 與 83 章，敘述西元 69 年羅馬帝國內戰期間，維斯帕西亞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吉朋並下了一個註：「這曾經是羅馬城遭到維斯帕西亞努斯軍隊猛襲時，隨處可見的可怕而又可憎景象。」他繼而感嘆：「自那時以來，每一項製造災難的原因都已大增力道，而數世紀的循環或許帶來同樣的災禍，但數個世紀卻可以循環，而未能出現另一個塔西陀來給予描述。」[251]

結　語

《羅馬帝國衰亡史》是啟蒙時代史學的巨構，這部史學經典之所以會在 18 世紀出現，並非偶然。文藝復興時代以來，歐洲史學出現兩個重要學術傳統。一個是古典考據學的興起。從 16 到 18 世紀，歐洲古典學者對古代希臘與羅馬的古典與文物，進行無數的發掘、整理與考證的工作。在這過程中，古典學者累積豐富的古史資料，可資重建古代歷史的面貌。[252]另一個是歷史書寫風格的發展。從 15 世紀起，經歷人文主義史學、理性的歷史、到哲學的歷史學，歐洲史家逐步發展出一套可以結合「真相」與「修辭」的敘事方式。

長期以來，這兩個史學傳統各自發展，形成兩個世界，缺乏對話。古典學者擅長考訂工作，發現許多個別的事實，卻不知其價值或用處。在自然哲學當令的時代，古典學者的努力往往受到輕賤，認為是玩物喪

斯與維提里烏斯兩軍相爭，維斯帕西亞努斯軍隊攻陷羅馬城的景象：「民眾聚在一旁觀看戰鬥，就像在觀賞一場表演。他們時而向一方，時而向另一方拍掌叫好，好像是看競技場的一場演習。每當一方敗退，士兵躲進店鋪裡或逃入私宅，旁觀的暴民就把這些士兵拖出來當場殺死，並搶到大部分戰利品，因為士兵們正專注於流血與屠殺，戰利品便落入群眾手中。城市到處可以看到可怕而又可憎的景象：這裡在戰鬥與傷亡，那裡的浴場和酒館卻營業如故；這裡滿地血腥、屍首成堆，一旁的妓女與恩客還在歡愛。各種與放縱與淫樂有關的罪惡、所有可怕的行為，都出現在這場淒慘的城市攻掠戰中。」Tacitus, *The Histories*, trans. Kenneth Wellesle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64, 1972, 1984), p. 197.

251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4, p. 45, n. 117.

252 參見楊肅献，〈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頁 119-1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志，誠如吉朋的感嘆：

> 雖然有時是他們的辯護者，但從來不是他們的同黨。我坦白認為，他們的治學方法粗陋，正如他們的工作流於細微、瑣碎。一種炫學的考據風堵塞了他們的想像力，他們毋寧是刻板的編纂家，而不是創新的古典學者（Scholiast）。這個時代方才啟蒙到能夠理解他們的研究的用處，但仍既未能理解、也未高明到知道，藉由哲學之光的照射，他們可從其中獲取什麼裨益。[253]

另一方面，從人文主義史學到理性的歷史，歐洲史家逐步發展出一種俗世的、批評的、普世的「哲學的歷史」書寫理念。但是，如何實踐這種新的史學理念，是一大挑戰。伏爾泰、休姆與羅伯森都寫過「哲學的歷史」，然均有不足之處。伏爾泰的歷史寫作風格創新，卻實證不足；休姆與羅伯森的文采與哲思俱佳，但在史料引證上，並沒有明顯突破。

吉朋是近代早期歷史家中，唯一認識到這兩個史學傳統的意義，並知道如何將兩傳統進行創造性結合的人。他以哲學的歷史識見，把古典學者考證過的無數事實拿來當作證據，將其納入一個宏觀的大敘事架構中，這就是《羅馬帝國衰亡史》產生的學術脈絡。從歐洲史學的大傳統而言，吉朋的歷史書寫乃是李維史學與塔西陀史學的結合，兼具李維的宏大歷史架構與塔西陀的深刻歷史分析。

（責任編輯：石昇烜　校對：李　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53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9.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伏爾泰著，吳模信等譯，《路易十四時代》。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西塞羅著，〈論演說家〉，收入西塞羅著，王曉朝譯，《西塞羅全集．修辭學》。臺北：左岸出版社，2005。

孟德斯鳩著，婉玲譯，《羅馬盛衰原因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2005。

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塔西佗著，王以鑄、崔妙因譯，《編年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Bacon, Francis.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Dent, 1915/1962.

Boswell, James. *The Life of Dr. Johnson.* London: J. M. Dent & Son, 1933.

Chambers, Ephraim. *Cyclopedia; 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 2 vol. London: J. and J. Knapton,1728.

Campbell, John.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to the Present: Compiled from Original Authors.* London: printed for J. Batley; E. Symon; T. Osborne; and J. Crokatt, 1736-1766?.

Cassius, Dio. *The Roman Histo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7.

Cicero, Marcus Tullius. *De re publica & De legib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W. Key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Craddock, Patricia B., ed. *The English Essays of Edward Gibb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Gibbon, Edward.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Gibbon, Edward. *Journal B.* Cited from David P. Jordan,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Gibbon, Edward.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Methuen & Co., 1905.

Gibbon, Edward.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ces by David Womersley. London: Allen Lane, 1994.

Gibbon, Edward.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Printed for T. Becket and P. A. De Hondt, in the Strand, 1764.

Gibbon, Edward.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5 vol.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Murray, 1814.

Hearne, Thomas. *Ductor Historicus: or, A Short System of Universal History,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t.* London: printed by H. Clark, for Tim. Childe, 17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ume, David.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London: Henry Frowde, 1903.

Low, D. M., ed. *Gibbon's Journal: To January 28th, 1763.*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29.

Murray, John. *The Autobiographies of Edward Gibbon*, 1896.

Norton, J. E., ed. *Th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 3 vols. London: Cassell, 1956.

Tacitus, *The Histories*. Translated by Kenneth Wellesle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64, 1972, 1984.

Tacitus. *Agricola and Germania.* Translated by Harold Mattingly. London: Penguin Group, 1948/2009.Voltaire, *Nouvelles considerations sur l'histoire*. Cited from J. F. Lively, ed.,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Longmans, 1966.

二、近人研究

楊肅献，〈青年吉朋——一位羅馬帝國歷史家的養成〉，《新史學》第 12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臺北，頁 52-62。

楊肅献，〈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臺大歷史學報》第 51 期，2013 年 6 月，臺北，頁 119-180。

華班克（F. W. Walbank）著，翁嘉聲譯，〈英文版導讀〉，收入波利比烏斯（Polybius）著，翁嘉聲譯，《羅馬帝國的崛起》。新北：廣場出版，2016。

Billanovich, Giuseppe. “Petrarch and 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Livy.”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4, no. 3/4 (1951, London), pp. 137-208.

Black, Robert.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Beginning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6, no. 378 (January 1981, Oxford), pp. 36-58.

Bowersock, G. W. “Gibbon on Civil War and Rebellion in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105, no. 3 (Summer 1976, Cambridge), pp. 63-71.

Bouwsma, William J. *Venice and Defense of Republic Liberty: Renaissance Values in the Age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Bouwsma, William J. “Three Types of Historiography in Post-Renaissance Italy.” *History and Theory* 4, no. 3 (1965, Connecticut), pp. 303-314.

Brumfitt, J. H. *Voltaire: Histor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Burke, Peter. “A Survey of the Popularity of Ancient Historians, 1450-1700.” *History and Theory* 5, no. 2 (1966, Connecticut), pp. 135-152.

Carrithers, David. “Montesquieu's Philosophy of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7, no. 1 (January-March 1986, Pennsylvania), pp. 61-80.

Cartledge, Paul. “The ‘Tacitism’ of Edward Gibbon (two hundred years on).” *Mediterranean*

臺灣人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Review 4, no. 2 (1989, Israel), pp. 251-270.

Evans, J. A. S. "Father of History or Father of Lies: The Reputation of Herodotus." *The Classical Journal* 64, no. 1 (1968, Illinois), pp. 11-17.

Finley, M. I. "Introduction." In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4 /1972.

Fryde, E. B. "The Revival of a 'Scientific' and Erudite Historiography." In *Humanism and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3.

Ghosh, Peter. "Gibbon's First Thoughts: Rome, Christianity and the *Essai sur l'Étude de la Litterature*, 1758-61."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5 (1995, London), pp. 148-164.

Gilbert, Felix.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Grant, Michael. *The Ancient Historians.*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Books, 1970.

Green, Louis. *Chronicle into History: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Florentine Fourteenth-Century Chronic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Hay, Denys. *Annalists and Historian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nthuen & Co. Ltd., 1977.

Hay, Denys. *Renaissance Essays*. London: The Humbledon Press, 1988.

Howatson, M. C., and Ian Chilvers, eds. *Oxford Concise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Hsia, Po-chia. *The World of the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Huppert, George.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Historical Erudition and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Renaissance Fran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0.

Johnson, J. W. *The Formation of English Neo-Class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Johnson, Samue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ed by Alexander Chalmers. London: Studio Editions Ltd, 1994.

Jordan, David P.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Kagan, Donald. *Thucydides: The Reinven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9.

Keynes, Geoffrey, ed. *The Library of Edward Gibbon.* 2nd ed. Dorset: St Paul's Bibliographies, 1980.

Low, D. M. *Edward Gibbon 1737-1794.*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7.

Kelley, Donald, ed. *Version of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nlighte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Kelley, Donald, ed. *Faces of History.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effler, Phyllis K. “The ‘Histoire Raisonnee,’ 1660-1720: A Pre-Enlightenment Gen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7, no. 2 (April-June 1976, Pennsylvania), pp. 219-240.

Mann, Nicholas. “The Origins of Humanism.”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enaissance Humanism*. Edited by Jill Kray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omigliano, Arnold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hillips, Mark. “Machiavelli, Guicciardini, and the Tradition of Vernacular Historiography in Flor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4, no. 1 (February 1979, Oxford), pp. 86-105.

Pullapilly, Cyriac K. *Caesar Baronius: Counter-Reformation Historia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5.

Reith, Gerda. *The Age of Change: Gambling in Wester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2.

Reynolds, L. D. and N. G. Wilson. *Scriber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Ryan, E. A. *The Historical Scholarship of Saint Bellarmine.* New York: Th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36.

Trevor-Roper, Hugh.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Macmillan, 1967.

Trevor-Roper, Hugh.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History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John Roberts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Ullman, B. L. “Leonardo Bruni and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In *Studie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pp. 321-344. Roma: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55.

Vance, John A. *Samuel Johnson and the Sense of Histor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

Walsh, P. G.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White, Jeffrey A. “Introduction.” In Flavio Biondo, *Italy Illuminated*, vol. 1.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effrey A. Whi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Wootton, David. *Paolo Sarpi: Between Renaissance and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Young, G. M. *Gibbon.*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2 (December 2018), pp.139-212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812_(62).0004

From Humanist History to Philosophical History: Gibbon's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Its Modern Historiographical Context

Yang, Su-hsi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Edward Gibbon's historical thinking behind his writing of the monumental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Decline and Fall*, a landmark of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was obviously writt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the idea of 'philosophical history', a novel genre of historical writing which was developed out of the humanist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and which Gibbon had inherited and helped to perfect. This article will cover three aspects: 1stly,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umanist history to philosophical history; 2ndly, discuss Gibbon's thinking on facts, historical truth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and 3rdly, reveal Gibbon's thinking on the writing of 'philosophical history' and his ideal of an philosophical historian.

Keywords: Edward Gibbon, Enlightenment, Roman Empire, humanist history, philosophical histor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R.O.C.);
E-mail: yangsh@ntu.edu.tw.